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3月30日第32期（增刊）

## 本期目录

### 〔徐友渔文革反思专辑〕

#### 阅史漫笔

- 徐友渔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文革反思之一）
- 徐友渔 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文革反思之二）
- 徐友渔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反思之三）
- 徐友渔 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文革反思之四）
- 徐友渔 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文革反思之五）
- 徐友渔 谈谈文革的“大民主”（文革反思之六）
- 徐友渔 幻灭、觉醒与反叛（文革反思之七）
- 徐友渔 经历特殊的一代人（文革反思之八）
- 徐友渔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文革反思之九）
- 徐友渔 晚霞消失之后的正义
- 徐友渔 如何道歉，谁来道歉？

#### 生逢乱世

- 徐友渔 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

### 〔徐友渔文革反思专辑〕

说明：在文革研究领域，徐友渔是们都熟悉的先行者之一。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①他对文革有切身体验，亲身参加了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介入很深”），同时他又较早开始搜集文革资料和对文革亲历者进行采访，在这方面有很丰厚的积累；②他既有体制内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的身份，又始终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上研究文革，对官方出于政治需要而设定的历史结论和学术教条总是持批判态度；③他精通外文而能够直接阅读欧美学者有关文革研究的论著，及时了解到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与之交流。这些都使他的

文革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视野。近年尽管他因参与一些社会活动而未能以更多时间精力撰写文革方面论著，仍时有新文在网上发表，只是出于“你懂的”原因，一般读者难于读到。本刊特编发这一专辑供关心者参考。

徐友渔简介：1947 年生于四川成都，文革中是成都市第一中学高三学生，参加了当时成都地区最有影响的一大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并成为其骨干和小“理论家”。造反运动结束后下乡当知青。文革后恢复高考成为 1977 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学生；1982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



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北海道大学任特聘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从上世纪末开始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 20 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人文立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哲学》、《与时代同行》、《文化大革命的遗产》（日文）等著作，编辑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参与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

## 【阅史漫笔】

###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

#### ——文革反思之一

徐友渔

重庆事件的意义和严重性，不在于它超过 007 警匪片的情节，而在于所谓重庆模式所代表的路线和政策。在检讨重庆模式的方向性含义时，看到它与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和相似性，很有启发。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系，把这一点挑明的是总理温家宝，他在 2012

年“两会”结束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把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且告诫说，要警惕文革在中国重演。

重要的是人们确实认为重庆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在重庆模式红极一时还是这个神话破产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老百姓分成壁垒分明的两派，一边拥护薄熙来，拥护重庆模式，也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呼唤文化大革命应该在中国再来一次；另一边则反对薄熙来，谴责重庆模式，特别呼吁要警惕文革，防止文革在中国卷土重来。

重庆模式当然不会完全重复文革，不过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是二者一致或相似的。

**首先，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共同具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践踏法治。**

文革中，现行的宪法、法律完全失效，被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取代；乱抓、乱捕、乱判是家常便饭；公安、检察、法院的监督与制衡功能荡然无存；专案组林立，逼供信成了常规。在重庆，薄熙来、王立军的话是绝对不可违抗的命令；文革结束后中央立誓永远废除的专案组堂而皇之复活，刑讯逼供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文革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时，他拿出《宪法》，说自己是国家主席，宪法保护他的人身权利，但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嘲笑。而重庆炮制的李庄案则说明，法律成了儿戏，法院成了搞笑的场所。

**第二个特点是意识形态狂热，重庆的“唱红”和文化大革命搞“红海洋”等“革命化措施”是一回事。**

有人说，“唱红”是人们艺术和文化的喜好，但在重庆，不是个人喜欢唱就唱，不喜欢唱就不唱，而是有组织地唱，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经常组织大型演唱会和比赛，据说有的演唱会参加人数高达10多万，整个唱红歌运动卷入的人数高达千万。这已经不是人们对于某类歌曲的个人喜爱，而是政府动用公权力强行发起和推动的运动。

强推红色意识形态和破坏法治有密切联系。公然侵犯、践踏法治，需要一种非常氛围，需要把现存的秩序、规矩打破，需要一种革命的气氛，替天行道的气氛，说现在正在行正义，其他的都可以不顾，这就要靠“唱红”等等，使掌权者可以为所欲为，把所做的事情说成是代表了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正义是一致的。

**重庆模式和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得到了相当多的人拥护。**

不能因为薄熙来垮台了就以为重庆模式是狗屎堆，不论从网上还是别的地方都可以知道，他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和文革得到了广大中国老百姓的拥护一样，哪怕在他垮台以后仍是这样。毛与薄成功地得到民众支持的共同原因是，他们伪

装成是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他们把平等、共富、社会公正的旗子抓在自己手中。

古今中外，在统治者和掌权者中有少量这样的人，他们本身是不公正制度的缔造者、维护者、既得利益者，但他们不像一般贵族、官僚那样只是教条地为现存制度辩护，在权力斗争需要的时候，他们敢于利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平民的代言人。文革前夕，毛泽东批评官僚说，“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文革初期，他指责按惯例向大学派工作组的刘少奇，说“只有反动派，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薄熙来自己以前在大连工作时搞的一套就是以权谋私，利用和支持黑社会，但他到重庆之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他的前任，他自己在制造极大的不公正，却打出公正、平等的旗号，他的所谓“富民”工程和“亲民”口号使他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社会本身存在严重的不公正、不平等，存在官民冲突（以前叫干群矛盾）、贫富差距，这些就是群众支持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的社会土壤。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没有多少人公开表示支持文革，那时候人们对于文革的苦难记忆犹新，而当时中国似乎正在走一条与文革的方向相反的道路，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政策，燃起了人民的希望和信心。到了 90 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触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 年代的局面与 80 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受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破门而出，重庆模式破土而生，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面旗帜，一块红色根据地。

文革的成功发动和重庆模式大行其道，与中国人缺乏宪政民主与法治观念有关。自从 1949 年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上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人根本想不到，而当时也完全没有条件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解决贪腐与社会不公的问题，毛泽东以前被塑造成“大救星”，文革再一次充当“大救星”，他“解放群众”，群众为他卖命，扫除政敌。对于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据这样的经验，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不见成效，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绝望的人们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难消失了，镇压不存在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平等的时代，追求理想的时代，人们道德高尚、大公无私，官员廉洁奉公。

在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抗议集会和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和文革的口号。反贪腐、反官僚、反特权、反既得利益，相同的口号把两个不同的时代联系起来。

令人痛心和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重庆模式的考验面前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如果说文革中出了“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班等还可以用时代蒙昧和政治高压来辩解，那么，在 21 世纪还争先恐后地赶去重庆朝圣或献策，那算什么呢？那些给王立军颁发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证书的大学，又算什么呢？时至今日，还有学者替重庆模式评功摆好，说重庆毕竟一段时间治安良好，比较突出地提出了“共富”的口号。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材料揭露重庆在这方面造假的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重庆在这方面真有一定成绩，那么很多人政治认识不过关的事实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社会治安和福利当然是可取的评判标准，但是，我们知道，在希特勒统治的法西斯德国，在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在二战前军国主义的日本，这些方面也做得相当不错，甚至超过了民主宪政国家，但是最后的灾难有多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这么说，整治卖淫嫖娼这种丑恶社会现象最有成效的，是专制、极权、神权国家。在评判重庆模式时，除了被造假所欺骗，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暴露的问题是缺乏法治观念，他们对于践踏法治的恶行不敏感。其实，就算重庆的治安和共富真假难辨，李庄案的天大笑话是很容易辨清的，何况还有江平、贺卫方、童之伟等学者的揭露与批判。不管怎么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地方的政策是践踏法治、草菅人命，制造错案、冤案，任意杀人，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那无论如何不能赞成和支持。最可靠的，处于首位的评判标准应该是法治和人权。这是评价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的应有标准。其他标准当然也很重要，但它们只有在不破坏法治和侵犯人权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

举目看神州，贪腐特权日趋加剧，社会不公无法矫治，毛泽东、薄熙来阴魂不散，民众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渠道，文革“反官僚、反特权”的“大民主”越发有吸引力，防止文革和重庆模式再次出现的唯一良方，是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是真正实行政治改革。

---

【阅史漫笔】

## 毛泽东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

### ——文革反思之二

徐友渔

重庆事件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并非一场早已被忘却的噩梦，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不是板上钉钉被宣判的一场浩劫，而是被相当多的人当成“人民的盛大节日”，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手段。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绘的那样，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施展阴谋而展开；也不像一些简单地反对文革的人以为的那样，单纯是人们上当受骗。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文革得到亿万人拥护，他们真心诚意、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要理解当前为什么许多人呼唤文革，就需要理解当初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投身于文革。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革持续多年，亿万人积极投入，必有其社会基础、舆论基础、群众心理基础，简单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有以下基本条件。

###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

这使得他能够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党和全国，强行发动文革；这使得他的话成为“最高指示”，代替了宪法和法律，他说哪一个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个人就罪该万死，他说哪个组织、哪个人是“反动的”，他们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地位，和他所领导的党的性质有关，和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有关。

### **政治挂帅、革命第一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既是教育灌输的内容，又是评价个人表现的标准，据此，不积极投入政治运动是自甘落后、自毁前程。按照惯例，在一场运动结束时要对每个人做政治鉴定，人们的积极性和表现要记录入档案，在以后的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日后的总书记胡锦涛文革中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文工团（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而总理温家宝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普通一兵。

### **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防修（正主义）反修”的宣传。**

这使得人们以为中国社会存在许多阶级敌人，妄图变中国为外国的殖民地，使中国人民受欺压、受奴役，而阶级敌人已经在各级政权中找到了代理人，这些窃据领导职位的家伙妄图使中国的发展道路从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

需要指出，单纯用政治运动传统和意识形态氛围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亿万群众紧跟毛泽东投身于文化大革命，解释他们的激情理想和决心斗志。人们的斗争必定与某种切身利益相关，这里的秘密是：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公正、不平等的，而毛泽东以极高明的手法让人们相信，他是群众利益的代表，他发动文革就是要追求公正和平等；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大布迷局，使得他的政敌与群众发生尖锐冲突（尽管那些党官僚完全是按照惯例行事），他以受压制群众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现，文革中“造反”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誓死决心不仅来源于他们在“主义”上对毛泽东的服膺，更来源于他们认为毛泽东代表了正义、平等，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遭失败，毛泽东被迫把管理日常党务的权力交给刘少奇，他逐渐感到大权旁落，下决心打倒刘，他以猛烈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式攻击刘，大谈现实中的弊病，在 1965 年初甚至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教育界是毛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说：“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出偏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可以想见，文革刚发动时毛的这些话广泛流传，是多么大快人心，劳动人民和学生们是多么有理由欢呼：“毛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像毛这样极高明的统治者（以及像薄熙来这样的野心家）是多么善于说出群众的心里话啊！

不难理解，毛的这种为民请命的姿态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戴（怪不得“乌有之乡”网站能聚集如此众多的毛分子），但对于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这里不能仔细辨析，仅指出两点就够了。

第一，如果说存在严重弊病，那么始作俑者是毛，他是大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早在 1953 年，他就严厉指示：“凡用这样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大家都知道，中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正是划分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最大盘剥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些政策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的，而发动导致 3000 多万人饿死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其罪魁祸首正是毛泽东本人。

第二，毛泽东指出的教育方面的弊端，固然有部分属实，但他的解决办法却是荒唐可笑的。在关于教育的同一讲话中，毛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文革中出现白卷先生张铁生强行上大学、管大学和改造大学的“模范事例”，成了中国教育史上永远的笑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施展策略手段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发动文革，出于毛的个人意志，但他把第一线工作交给刘少奇，让他引火烧身。1966 年 6 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两人专程飞到毛休养的地方杭州，向他汇报情况，并请他回京主持工作。毛表示暂不回京，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邓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文革烈火已经烧起来的大、中学派工作组。按照中共“集体领导”原则，毛并无权力否定这个决定。此外，派工作组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的一贯方法，土改和四清运动也派工作组。而且，前不久毛还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会后，刘将决定电告在杭州的毛，他也没有表不赞成。

毛通过密报知道工作组在学校里和少数造反学生尖锐对立，他 7 月 18 日回

北京后，马上就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到了8月5日，他亲自出马攻击刘少奇，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指责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刘不派工作组，毛就会指责他“放弃党的领导”，“听任牛鬼蛇神翻天”。

毛作出了一系列姿态以争取群众，他把路线分歧的焦点说成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把自己和刘少奇的区别说成是保护还是镇压群众。这种扮演解放者的努力在10月初毛派下达的一个中央文件中达到了高峰，文件宣布：“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整人者向被整者赔礼道歉，整人的利器——档案材料被销毁或交还本人。难怪得到“解放”的群众会含着热泪发誓，要死心塌地跟随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只是到了毛泽东达到目的之后把追随他的学生赶下政治舞台，只是当毛派到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以前的工作组更厉害地镇压学生时，人们才看清楚毛在文革初期实行的“群众路线”不过是争取人心的表演而已。

正如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一书中所说：“毛动员和利用红卫兵的方式和慈禧操纵义和团的方式极其相似，他把群众普遍的不满用于针对他的敌人，而这不满是因他自己的统治产生的，这种不满本可以是针对他自己的……毛本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青年不满和感到沮丧的原因，他们随时都要爆发。毛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指控他的私敌为造成这制度的根源（而实际上他才是始作俑者），然后把广泛的愤慨引向他们，把他们搞掉……红卫兵最后意识到上了当，但这已为时太晚。”

---

【阅史漫笔】

##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 ——文革反思之三



## 徐友渔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研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避免不了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的真实动机，由于毛对此秘而不宣，所有的猜测都缺乏证据，如果想从毛本人和毛派宣传机器的阐述中得出结论，那么一定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重要事实、与文革相关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和思路进行分析和推断。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回答大致有三种。

一种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官僚的路线和政策分歧，毛不能听任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带向背离革命初衷的资本主义，决心发动文革打倒这些人，拨正革命的航向。与此类似的解释是毛泽东出于社会主义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失去和群众的联系。

第二种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大革命》中认为：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杜特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中国人熟知的文革研究者麦克法夸尔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我的看法与第三种解释相近。虽然在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了政

治上的搭档，刘被确立为毛的助手和接班人，但在刚夺得政权之后两人就发生了分歧，刘要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毛则毁弃公开宣布过的政治纲领，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毛对刘非常不满，早早就产生了换马的念头，只不过高岗把毛交付的事情办坏了，刘才继续在位。而刘少奇收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留下的烂摊子相当成功，毛感到忧虑和大权旁落，并怀疑刘在他死后（甚至生前）要对他作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的报告，毛发动文革来将刘铲除。

这个观点在赵家梁（高岗的秘书和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所著《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得到证实，赵说：“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该书还披露说，毛让高岗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 20 年代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我们知道，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而材料的搜集和准备 10 多年前已经开始，毛的深谋远虑真是了不得。

毛把刘视为党内高层中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说来话长。

斯大林死后，毛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头号领袖的交椅该轮到他来坐了。从个人经历、威望，在本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方面看，苏联新领袖赫鲁晓夫不在话下，唯一的问题是比经济实力，中国远不如苏联。于是毛发动了大跃进，表面上是要赶超英国，实际上是要在经济上与苏联并驾齐驱。大跃进以惨败告终，彭德怀提出意见被毛当成是向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挑战，就像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一样。1962 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务实路线得到党内多数认可，这时彭德怀写长信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毛于是把刘少奇也当成赫鲁晓夫，认定他要为彭德怀翻案。毛发动文革，就是要先发制人，除掉有可能清算自己错误的所谓“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以上观点，早在 1967 年由弗朗茨·迈克尔在其研究文革的“权力之争”一文中提出；前《人民日报》副主编，一度深得毛泽东欣赏的王若水在 1996 年为纪念文革发动 30 周年而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以上解释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主观动机，但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毛不采用惯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宣布刘少奇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头子，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呢？

毛之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不通过惯常的党内斗争方式和组织手段剥夺刘的权力，是因为他在组织上未见得占优势。由于毛发动的大跃进遭到惨败，刘少奇等人的经济调整方针大见成效，刘和他的同僚在党组织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毛不能通过诸如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把刘干掉。这也是自 1956 年中共八大之后，毛一直推迟不召开九大的原因（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应5年一次)。相反，刘正是利用正常的组织手段和运作程序逐渐侵蚀毛的权力。

仔细分析一下毛、刘之间的交锋，可以发现，毛依仗他在历史上形成的权威，当与刘发生分歧和斗争时，在正式场合下占上风是不难的。但刘也有对应之计，他退避三舍，表面认输，在路线和方针上屈服而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队伍，然后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刘可以轻易地、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可以降职，但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什么“甄别”、“纠偏”、“平反”之类的事屡见不鲜，而毛利用组织手段整刘，充其量以撤职了事，他若要将刘“斗倒斗臭”，彻底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只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党内斗争的经验还表明，通过上层斗争，毛只能清洗个别政治对手，而不能刷掉一大批人。当毛发动文革时，他年事已高，他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清洗刘少奇大大小小的余党，自上而下的夺权对他太费时间了。正如他在1967年2月3日对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卡博和巴卢库所说的那样，他以前只是解决个别问题，个别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文革是他找到的一种新方式，自下而上地进行公开、全面的斗争。也正如伯雷汉所断言的：“毛对于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从个人气质和革命斗争经验方面看，毛比刘更喜好和善于利用大规模群众斗争这种形式，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毛天性讨厌官僚体制，反对秩序，喜欢打破常规的无序状况。他最喜欢用来刻画自己性格的话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善于制造天下大乱，在混乱中驾驭群众，利用局势。毛虽然因退居二线而在组织方面占下风，但由于历史原因，由于自50年代后期起党内越来越厉害的个人崇拜风气和家长制倾向，毛的个人份量是刘远远不及的，他在不能透过党的官僚体制贯彻意志时，可以直接诉诸于群众，利用计谋获得人民的广泛、狂热支持。在群众运动中，他轻松自如、左右逢源，而刘像个力不从心的救火队员，最后引火烧身。在彻底抛弃了党章国法，砸烂各级党组织之后，刘像晾在岸上的鱼，任毛摆布。

刘少奇的最终结局不仅是失去权力、被剥夺了职位，而且是被整死，这才是彻底解除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常规的党内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在混乱的运动状态中才做得到。

---

【阅史漫笔】

## 不能回避毛泽东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 ——文革反思之四

徐友渔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中那么多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那么多人受苦不过含冤自杀，那么多人被当成阶级敌人消灭；文革中冤狱遍地，冤假错案不计其数，正直、清白的人被当成是叛徒、特务，不小心打碎毛泽东石膏像或把印有毛画像的报纸垫坐，就是反革命；文革中武斗发展成毛泽东欢呼的“全面内战”，群众组织用正规军用武器开战，无辜的、无组织的群众被武装组织甚至军人开枪屠杀；文革中数千万青年人无学可上，被发配上山下乡吃苦，虚耗大好青春，耽误自己并殃及家人。

对于这一切，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有没有责任，有什么样的责任？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照这样的说法，对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毛的责任只是认识上的局限和偏差，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

我认为，仅仅用认识上的偏差和错误不能解释毛泽东的罪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做了那么多错事、坏事，有没有他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其中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部分，该不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正统的解释是，他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估计过高，把刘少奇当成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就算我们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而且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应该打倒刘少奇，在这种假设下我们还是要问：毛泽东有没有权利把一个与自己一道革命、共同战斗几十年的同事整得那么惨？对于刘少奇在极痛苦、极悲惨的状况下死去，毛泽东有没有个人责任？

“打倒刘少奇”，这是一个政治概念，但这只意味着剥夺刘少奇的职位和权力，这完全没有准确地说明毛在文革中对刘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毛是“诬陷和整死刘少奇”，毛通过中央专案组诬陷刘是“叛徒、内奸、工贼”，专门挑选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宣布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精神上残忍地打击和折磨他，重病中的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上飞机押送到开封，最后惨死在那里。

有人会说，毛大概不知道刘临死时的惨境，这不可能。从邓小平女儿的书中可以看出，邓下台后的情况，包括生活上的小事，毛关注备致，了解得一清二楚；

从陈伯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被关押的高级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工作人员不敢不报到毛泽东那里。毛对刘的境况的关注，只会超过而不会小于对邓、陈的关注。对刘少奇生命处于绝境的情况不向上报告，下级执行人员中有谁敢负这样的责任？

其实，很多罪责是不能用“认识”轻易开脱掉的。错误认识和实际上发生惨剧，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其间有若干重要的环节，涉及法律、道德、常识、人性等等，在任一个环节坚持良知和常识，遵守法纪，都会阻断错误认识导致惨剧。如果仅仅是主张“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更伟大，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这种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把这个主张推演为“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从而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张志新、王申酉、史云峰因此被枪毙那样，就远远不是认识问题了。再打一个比喻，如果有人真正认为“犹太人是惟利是图的、低劣的民族”而只是停留在嘴上和纸上，那么这个完全错误和荒谬的主张可以说是个认识问题，但基于这个主张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和毒气室，还能说仅仅是认识错误吗，难道希特勒仅仅是犯了认识错误？

除了整死刘少奇，文革期间毛泽东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罪的另一明显事例是纵容、支持和推动武斗。毛对于武斗中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枪下负有直接责任。

1967年夏季，毛泽东向军方发出指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

1968年春季，毛公布了他的论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请注意，那个时候的国共关系与今天的国共关系迥然不同，那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1975年，毛发布“重要指示”，其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很难设想，毛泽东作为被全体中国人无限热爱和拥戴的领袖，怎么可以把一部分中国人说成是共产党而把另一部分中国人视为与之不共戴天对立的国民党，怎么可以下令叫军队送枪给一派去消灭对立的一派。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一个高尚的社会理想，要实现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就算如此吧，问题在于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我们要问的是：哪怕你的理想是好的，你有没有权利拿人来搞共产主义实验？你是否可以搞政治清洗运动，甚至命令林彪“武装左派”，发枪给一派以镇压和屠杀另一派？你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

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流放山乡，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吃苦受罪？认识和理想是一回事，牺牲民众的利益、剥夺人的基本权利是另一回事。

其实，身受其骗和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认为毛泽东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他们早就提出了毛泽东的个人道德和品质问题。以下仅举几个见诸于文字的例子。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到，毛泽东完全清楚罗瑞卿是无限忠于自己的，但“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整罗瑞卿，毛泽东从来没有认为罗瑞卿有野心，是坏人。所以，除非是毛泽东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为什么会白白冤枉一个好人……”当然，这里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的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

林彪身亡后，毛泽东陷入空前尴尬的境地，因为正是他本人，给了林彪“接班人”的崇高地位。但毛泽东居然毫无惭愧的表示，反而借他给江青的一封信证明他早就对林彪有认识，自己还是一贯正确。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记叙了毛在这封信上玩弄的手法：他让周恩来把这封信出示给林彪，并在林彪看后当面烧掉，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却叫秘书抄了一份。徐景贤写下了当时人们普遍的疑虑：“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他还委婉地提示：“这封信从烧毁到公布的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至于写信人、送信人、读信人、烧信人、藏信人各自持什么心态，就只有留待读者和研究者自己去细心揣摩分析了。”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写到，1962年7月，刘和毛发生了一场争执，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愤怒地反问刘：“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毛对千百万中国人的死活持何态度，由此可见。

其实，毛泽东的人品如何，作出结论并不困难。人们既可以从他的政治斗争手法中认清他——比如在“反右”斗争中搞“引蛇出洞”，也可以从与他最接近的人的评价中了解他——比如林彪下级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或毛的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不敢正视毛泽东的道德品质问题，一定要把恶人说成是伟人，只能表明维护他的人自己的道德有问题。对毛泽东作出正确评价是中华民族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毛逝世已经3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只能生活在这个老魔头的阴影之中？

---

【阅史漫笔】

## 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 ——文革反思之五

徐友渔

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言说中，同时吸引中外人士发言，争论最热烈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话题，是有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所谓“两个文革”说是这样一种观点：与毛泽东在上层打倒政敌、党内清洗的文革相对应和平行的，还有一个在下层的人民的文革，这是一场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社会运动，它具有反官僚特权的性质。

“两个文革”说产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纪念文革发动 30 和 40 周年的 1996 和 2006 年的大讨论中，这个话题又引起热烈的争论。在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为数不少的人向往和呼唤着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文革”说对于这种倾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一些研究文革较深入的学者——如国外的李鸿永、陈佩华，国内的杨小凯（又名杨曦光）、刘国凯等，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他们认为文革不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且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文革中卷入斗争的各种群众并不是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有独立意识，利用文革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文革中造反派的利益表现在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保守派维护现存体制，即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双方的社会冲突构成文革的主要内容。

陈佩华断定说：“1966 年至 1969 年文革是反官僚运动。”她还说：“文革刚开始时，造反派被从压迫中解放自己的号召所发动。如果他们在头一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那么他们马上发展成为有自己政治计划的独立力量。”杨小凯也一直把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称为“准政党”，说它们是毛玩“自由结社牌”的产物。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1966 年 8 月至 1968 年中，有两年时间，毛泽东下令停止军队外的共产党组织活动，允许市民在政府注册自组政治组织。他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体制的不满，利用刘少奇、邓小平对市民进行政治迫害激起的民愤发动了造反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当时的中国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

社会冲突论者正确地看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毛的发动和支持下反官僚的，这就需要对群众的反官僚的性质作仔细分析。文革中最持久、最普遍、最带特征性的事件是群众起来批判斗争以前的官僚，但决不要忘记，他们批斗当权派的理由主要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修正主义”，至于官僚搞特权，欺压群众，那只是次要的理由。

造反派是受毛的挑动和利用以反对毛自己的政敌，还是反对执政党和现存制度？杨小凯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我个人的经验和研究结果与这种论点格格不入。首先，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一般是所谓根红苗正的人，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被人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造反，他们一动就是“右派翻天”，“乘机搞阶级报复”。其次，造反派组织虽然不像保守组织那样搞血统论和坚持极端左倾的政治标准，但仍然用类似于文革前党的标准看组织问题，不太愿收留“有问题”的人或不满分子，因为怕被对立组织抓辫子，被说成“组织不纯”，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是按当时的标准，如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是否党、团员）推举的。这样的组织敢于在最高领袖号召之下向以前被奉若神明的中下级党组织进攻，却不会在本质上反对党。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党毕竟是由毛缔造和领导的。

可以说，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但这种行为的效果却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在冲击大小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仅极易被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干脆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应该承认，造反派中除了许多人是受毛的号召造反之外，确有很多人怀有不满情绪，但准确地说，他们是对当时现实中的种种现象不满，而不是对共产党不满。认识到毛实际上是官僚体制的缔造者和最大代表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在当时，恐怕没有人能认识到，如果毛发动的文革取得胜利，官僚体制将比以前不合理和残忍十倍。

刘国凯在 2006 年发表《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其中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手段，目的是清洗中央、省市高层中的异己势力。故此，毛的官方文革亦可称之为文革清洗。此外，由于文革中发生了民众反抗运动，毛及地方官僚和军方都各自或联手进行过镇压，故官方文革还有一个内容——文革镇压。文革清洗加上文革镇压就是官方文革的全部内容……人民文革所指的是文革期间的群众反抗运动，内容包括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争取生存权利和冲击共产党统治体制等等。故人民文革又可称之为文革反抗运动。”“人民文革是毛要搞党内高层清洗——官方文革——所付出的代价”、“人民文革由毛泽东的官方文革导出。换言之，没有官方文革就没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当今中国需要再来一次经过升华的人民文革”。

刘国凯的观点表明了某种程度的清醒，如果一定说有另一个文革，那么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



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打倒政敌，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这个主流运动之外，毕竟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的号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分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虽然，总的来说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但我承认，“两个文革”说至少具有以下明显优点。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官方关于文革的神话，力求探索文革的真相。那种神话，不论是文革时由毛的文革派制造，还是文革后由获胜的反文革派制造，都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第二，它力图对文革中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的行为给予说明，它正视群众分裂为不同派别这一事实，它把投身于运动的群众当成具有各自利益的主体，这便于说明文革中亿万人的热情，相互斗争，以及他们的思想随着文革发展而产生的变化，因而文革产生了其发动者始料不及的后果，等等；第三，它力图揭示文革爆发前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结构，这对于理解文革中乃至今天中国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也许，“两个文革”说的问题是它对中国民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觉醒和反抗估计得太高、太早、规模太大、认识太彻底，这不是有无和对错的问题，而是对其程度的估量问题。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人们的觉醒和抵制要经历一个艰苦、漫长的探索 and 思想解放的过程，那些星星点点的，多半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火种，要到文革结束或接近结束时才变成可见的火炬。而今日中国人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已经不是，也不应该是对于“人民文革”的发扬光大，而是对于宪政民主理念的体认，这是中国人自文革结束至今 30 多年探索与实践的结果。

---

【阅史漫笔】

## 谈谈文革的“大民主”

### ——文革反思之六

徐友渔

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亲身经历者的最可怀念之处，对于一些未曾经历者的最大魅力，是它的“大民主”。民主，在 1949 年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多与少的问题，在 1949 年之后的共产党统治时期是有与无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反例，毛泽东在文革中不但给予中国人民民主，而且是“大民主”，那么，文革到底是一场灾难、浩劫，还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对文革的“大民主”作出准确说明和正确评价，对于文革思考和研究是难度最大的问题。

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享有“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四大”具有太强的中国政治运动意味，简单直白地说就是有言论自由，这里说的言论具有揭发性、批判性，主要是针对上级或权威。

就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意义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享受了“大民主”。在平时，老师对于学生是具有权威的，校长是高高在上的，但在文革中学生可以给他们写大字报，揭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说成是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开会批判斗争；在平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某个具体的领导就是反党，1957 年的反右运动的政治逻辑就是如此，55 万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成了罪人，而在文革中，批评领导，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炮轰”、“火烧”，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和保护，对群众批评的压制本身就构成了“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

文革之前，群众对于领导的官僚作风和特权享受心存不满而没有渠道表达，学生对于枯燥的教学、沉重的作业负担形成逆反心理而得不到宣泄，文革似乎是彻底的改变，生活好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情是舒畅的、解放的。由于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要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想到要批判“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想批判的是自己的师长、顶头上司，最多是本部门、本地区的领导者，一般情况下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人们真心诚意地认为“言者无罪”兑现了，文革实行了“大民主”。

文革中人们的要求、眼界、认识水平相当有限，往往没有触及“大民主”的界限和条件，因此完全没有思考过“大民主”的本质。现在来看看，文革中的“大民主”到底是什么。

首先，这种“民主”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真正要贯彻实行的宪法、法律性规定，而是毛泽东用来发动群众打倒政敌，在党内搞大清洗的手段。文革中江西有个当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中学生李九莲，因为在给男朋友的信中和日记中表达了对文革的怀疑而以反革命罪被捕，最后判处死刑。作家胡平在记述她的遭遇时，对于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么说：

他老人家想放时，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  
他老人家想收时，能收得万马齐喑，百雀禁声……

平民百姓呢——

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了，你就有说他是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枪将军的自由……

在文革十年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来说，只像是钢板与复印机，刻上什么，就是什么，要复印的是什麼，就是什麼……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文革的“大民主”时，他们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文革中有一个以《公安六条》著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说，攻击毛泽东和林彪的，是现行反革命；第五条说，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动言论，要斗争，或交公安部门处理。文革中有一条非常普遍的罪名简称“恶攻”，即“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不满毛泽东、林彪或江青而在这条罪名之下被逮捕、判刑的人超过 10 万，在上海，因为“炮打张春桥”而被加上“反中央文革”罪名的案件多达 20 多万起，受株连者达 100 万以上。

文革中，小至支部书记，大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提出打倒，看起来这种民主大得很，但这只不过是投合了毛泽东的心意，事实上，对于刘少奇的攻击，本来就是毛泽东发起和怂恿的。对于打倒刘少奇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后有反省的人认为那不过是被利用当了马前卒，没有反省的人则“好汉专提当年勇”：“老子文革时连省委书记都敢打倒！”

实际情况是，文革中不但没有发表不同观点的自由，而且没有表达任何独立思考的自由，连自以为体会和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尝试都不允许。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因思想和观点而遭难的三类人。

第一类，探索和坚持真理的人。遇罗克，批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张志新，不认同“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李九莲，认为“刘少奇的很多观点符合客观实际和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被判处死刑。

第二类，力图引申和发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坚决主张打倒“走资派”和官僚特权阶级，力主把本地区或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人，例如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曦光（湖南），发表《一切为了九大》的“中学生串连会”成员（上海）等，他们都被抓捕，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第三类，站在正统的立场，自认为有责任替毛主席把关、掌舵，强调尽管有文革，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权力结构不允许变动的人，比如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成员，《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其下场是被批判和抓捕。

当然，毛泽东要假戏真唱，在放网之后，收网之前，专政机器在短暂时间和个别地方出现了停转的情况，给极个别的人提供了传播独立思想的机会，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这种事例在文革中寥若晨星，而且，稍一收网这种人就遭逮捕和处决。文革确实使不少青年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但是，这与其说是文革“大民主”的积极后果，不如说是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或青春为代价附带产生的客观效果。

“大民主”因为文革之后复出的掌权者蛮横无理的取缔而更加为人们怀念和向往。文革后重新上台的领导人一度大力支持以西单“民主墙”为象征的“大民主”，因为他们需要民意的支持，也需要利用民意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争夺权力。但是，当西单“民主墙”上出现魏京生的大字报，批评邓小平是独裁者时，他们对于“大民主”的态度从利用变为取缔。1980年8月30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1982年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当局对宪法中“大民主”条款的取缔并没有终止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求和争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要求民主的呼声此伏彼起，始终不断。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两大重症，一曰民主缺乏症，一曰民主饥渴症，对于不清楚真正的民主为何物，只是经历过或听说过“大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文革的“大民主”是值得向往和争取的。但是，文革已经过去了30多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想主流不但深入探讨了民主的实质，而且正在把握民主的操作细节。人们不但明白民主的价值与作用，而且明白民主的界限和条件，尤其明白民主需要法治来界定和保障。在如今，虽然在诸如“乌有之乡”左派网站上充斥着对于文革“大民主”的歌颂，但民主运动主流追求的是宪政的、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领袖恩赐的，为上层政客争权夺利火中取栗的所谓“大民主”。

---

【阅史漫笔】

## 幻灭、觉醒与反叛

### ——文革反思之七

## 徐友渔

与毛泽东的期望相反，文革并没有把广大人民群众锻造成“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相反，相当多的文革积极分子对于原先的革命理想感到幻灭，他们苦苦思索，逐渐从文革的迷梦中觉醒，程度不等地得出否定文革的结论。

这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人们从狂热到清醒，从盲信到理智，许多人为自己执著的探索付出代价。在疏离和反叛文革的道路上走得较远的是学生，他们以前最为虔诚，文革是他们形成世界观的时期，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抱严肃认真的态度。

这些人对文革的背离与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文革的否定不是一回事。他们对文革的批判性思考远早于文革结束，他们改变的不仅是对文革的态度，而且扩展到1949年之后的路线、政策与实践，其中走得最远的力图重新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相当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搞的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探索最彻底的人则突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以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最初的怀疑与幻灭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思想转变的第一步是对于政治的厌倦和厌恶。文革其实是权力斗争，很快就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政治斗争其实无是非和原则可言，相反，政治很肮脏、阴暗和残忍。

江西的李九莲在一封信中说：“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有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我认为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

有一件事使忘我投入文革的学生耿耿于怀，毛泽东在1968年夏季发话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许多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毛要学生退下政治舞台的信号，但毛不想把他们请下去，而是以犯了错误为口实把他们赶下去。被欺骗、被利用的感觉油然而生，许多人开始明白，自己当了炮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古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本以为那是封建帝王的手法，没有想到伟大领袖把它用到了自己身上。

毛泽东把人数众多、忿忿不平的中学生发配到边远贫瘠的山乡，这使得他们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文化大革命

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破灭了。按毛泽东的本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在无数的场合，农民告诉学生的是他们的生活比不上从前，即“解放”前的日子，告诉学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日子，大办公共食堂的日子，有多少乡亲饿死。大量的知识青年回忆录都记载了这种情况，当生产队开所谓“忆苦思甜”大会（忆旧社会的苦，歌颂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的“阶级斗争教育”课）时，不论干部和书记预先怎么提醒，农民还是大讲特讲公社化时期苦不堪言的生活。

最后，是林彪事件彻底压垮了人们对于文革的信念。人们不得不思考，既然文革是用林彪取代刘少奇，那么文革的意义何在？既然号称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其实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叛党叛国的罪人，那么他的绝对正确从何说起？他发动文革是正确的吗？

为了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当局公布了他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份文件十分恶毒地攻击了现行制度，攻击了中共的政策，攻击了毛泽东本人，但不少人发现，它说的话既真实、又深刻。比如它这样说毛及其追随者：“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最大倡导者。”“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对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他是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阶下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迫变成替罪羔羊。”这份文件对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悲惨境遇有很到位的描述：“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是变相受剥削。”这些话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共鸣，它们由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说出来，说服力特别强。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是勤于思考者认真探索的产物，而一经问世，又成了刺激和促进其他人进一步探索的因素。这些文章不胫而走，影响很大，广州以“李一哲”为笔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突出的一例。

此文表面提出“批判林彪体系”，但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的制度和现实。与官方的宣传相反，它认为中国面临的危险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封建法西斯专制，这种法西斯专制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统治者的政治信念是“政权即镇压之权”，与臣民的关系是“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统治阶级成员无法无天、

不要法制，可以横行杀人、抢男霸女，等等。作者认为，文革的任务不在于“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在于锻炼群众的民主精神，要实现写了上了宪法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但是，人民群众并未通过文革而享受到这些自由，在文革后期，“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牢狱。”在中国，完全没有法制。文章提出了以下政治要求：人民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以“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为标准对群众施行镇压；应当保护人民群众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允许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存在；应当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应当有具体的规定，使人民群众行使对国家干部的监督权，当某些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失去群众信任时，可以根据明确的程序撤换他们。大字报还要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在“公产主义”口号下剥夺工农劳动群众的合理的经济利益，主张适当地恢复奖金制，以使勤奋劳动者，有发明创造者得到更多的物质报酬。

正是因为文革中最活跃、最有头脑、最勤于思考的那些人思想的转变，当中共高层在毛泽东逝世后发动反文革派的政变时，才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当中共改弦更张，实行与文革路线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政策时，才得到社会舆论压倒性的支持。确实，因为有对于文革的反思和反叛，原来文革的主力军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中坚。

附带地，可以把这里所说的情况与西方社会 1968 年那一代造反者做一个对比。

西方学生的造反出于自发而没有政治领袖操纵、指挥，造反运动失败和结束之后，他们身处的民主社会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他们不像中国的造反者那样受到惩罚、经历磨难，甚至被逼到绝境，所以他们没有认真反思，不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我批判，对造反行动的作用和实质重新认识。他们后来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文化、学术、政治等方面成为社会精英。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 年 5 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 1968 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 80 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在大学当教授的人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反资本主义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中国的一些洋博士囫圇吞枣地咽下种种时髦理论后，拿回中国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崔之元，他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

【阅史漫笔】

## 经历特殊的一代人

## ——文革反思之八

徐友渔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经历过运动反复曲折磨练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对于各阶层人民的状况，对于现有体制的弊端和不可触动之处有深切了解；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不像上一代人那样从学校到学校、机关、研究单位，而是对社会、对工厂、对农村有亲身了解；他们不像上一代人，大多只与同自己学历、职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打交道，他们在文革中，在下乡的日子与自己的战友、同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以后虽然前途各异，职业、地位不同，但相互间的联系仍然较为密切；他们经历坎坷，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只要有可能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对于其他人群，文革在学生身上打下的烙印较深，因为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有生计和职业问题的约束，思考的空间大得多。同样经历文革的学生中，文革之后对社会产生影响更大的是中学生，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要多得多，而且因为当大学生步入生活的正轨之后，中学生仍然处于挣扎和探索的状态。

当局在运动后期搞秋后算账，对大学生的追查和处理比中学生严厉，这使大多数大学生对政治感到畏惧，自愿或被迫远离政治，许多人发誓一辈子再不过问政治了。从运动后期开始，大学校园内恋爱成风，在分配前后，大学生们纷纷张罗婚事，而中学生则完全不是这样。大学生在分配后领取工资（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相比而言还算相当可观），进入国家干部行列，而中学生则上山下乡，这迫使他们正视中国社会的苦难，思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虽然大学生中也有许多人下到农场，或分配到基层，但大中学生在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使得他们对社会的感受会有所不同。另外，大学生有自己的专业，虽然许多人只念了一、两年书，但他们在文革后已另有奔头，他们力争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希望通过进修和自学完成专业训练，其中的佼佼者还想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这些说起来不算庸俗的打算把大学生的兴趣从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转移开了。而中学生谈不上专业，他们之中聪明、有上进心的人大多把兴趣放在便于自修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只有极少数人自学数理化和外语。

由于文革前所受的政治教育和经历的政治审查少于大学生，由于生活经历更坎坷，了解社会更深，中学生后来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强于大学生。他们之中后来学文科的更多，当教师的比例相当大，成为作家、画家、诗人、导演、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也很多，所以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部分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环境和氛围使他们和以前的大学生大不相同，他们的知识结



构，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的了解，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态度，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转变时期的一代新人。

就总体思想倾向而言，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是向右转了，因为文革暴露了以前所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最突出、最普遍的特点是他们有了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北京一个中学生（文革后是中级官员和作家）说：“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国十亿人就只有一个脑袋，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思维，其他的人只有服从。其结果是，毛泽东想对了，则全国的事都对，毛泽东想错了，则全国的事都错。文革后，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不能够以别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

文革前，人们的依顺心理还表现在每一个单位的人都盲目地服从或者敬畏领导，他们和领导的关系几乎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文革后，这一切都改变了。首先，人们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样，把反对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或工作组组长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何况，人们在文革中见到了无数事例，知道即使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并非真正的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文革中，人们看到，不论哪一级领导，不论领导人地位多高，声望多大，并无神圣性可言，并不天然代表真理。人们对领导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消失了，在文革中经历了大风大浪，增强了自信。一位曾当过市革委常委的学生说：“以前当学生时，觉得党委办公室里的活动和会议很复杂、很神圣，自己当了官，而且是很大的官之后，才发现这些事很简单。以前觉得领导凛然不可侵犯，文革后才发现他们也会点头哈腰，你有权力时他们也会讨好你。”另一个前红卫兵则说：“我在文革中和省委书记平起平坐，现在对领导也不买账。”

在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大大增强的同时，这一代人抛弃了文革前盛行的道德至上主义，看清了那是一种虚伪的、奴化的道德说教。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当那些道貌岸然的领导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候，他们却在过着享受特权的、腐化的生活，并竭尽全力为子女安排高人一等的前程。因此这一代人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傻瓜才会继续相信，可以指望来自党、国家、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也许是上当受骗的感觉过于强烈，也许是转向做得过了头，代替虚伪的道德主义的，是道德的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人们往往把任何道德的劝告都当成是虚伪的，把对于生活意义的追求视为是幼稚可笑的。正如石文安

（Anne·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所说的：“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

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与此相关的是人际关系向前现代方式回归，正如傅高义（E. F. Vogel）在《从人情到同志关系：共产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分析的，自1949年以来，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人际关系的标准和行为特征从中国传统的人情式转变成了同志式，这种价值的转变主要是通过恐惧而达到的，文革极左派领导以极端、粗暴的方式改造人，超过了人性忍耐的界限，使以前的价值和典范失去信誉。文革使人什么也得不到，迫使人们去寻找非正常渠道。以前革命的、阶级的关系变成了重视私人关系，于是有现在的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等等，这表明中国的人际关系又回复到传统模式的趋势。

这一代人比其他群体具有更强的整体意识和自恋倾向，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老三届”等等，以小说、回忆录、电影、电视剧、展览、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回乡专列等等形式来表现自己，相比于有类似经历而默默无闻的“回乡知识青年”、文革前支援边疆的农垦战士，这代人在社会上的喧哗是够厉害的，他们的喧哗本领是够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喜好形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态度。

这一代人的政治化倾向或社会责任感在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仍然强烈，甚至带有鲜明的自我中心的印记。他们认为这一代人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关键作用，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他们自认为具有前一代那样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但不像前一代那样教条和僵化，同时具有后一代那样的开放性，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与喜好，但不像后一代那样极端利己和玩世不恭。他们认为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吃过苦，了解中国国情，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关心民间疾苦。当中共十八大之后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登上最高权力之位时，这一代人认为在工程师掌权时代之后，知青一代掌权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其中有人不但对新局面喋喋不休，而且有跃跃欲试之情。其实，种种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这一代人的年龄已过，许多人已经退休，剩下的人即将退休，他们的自我期许只能表达于饭局，消化在餐桌上。

---

【阅史漫笔】

##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

### ——文革反思之九

徐友渔

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生的，在此之前，有个别人表达过民主的信念与追求，有零零星星的捍卫公民权利的抗议活动，但具有一定规模的、明确地以社会民主化为诉求的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是文化大革命，为产生和形成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

不少人力图在文革后的民主运动和文革中的“大民主”之间建立联系。有人认为，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民主运动，或者至少是日后民主运动的预演；有人提出，中国人在文革中真正享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还有人提出，毛泽东反官僚特权的思想为中国人争取民主和自由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这些说法可以推论，文革后的民主运动不过是在继续实践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不过是要恢复人们在文革中一度享有的政治自由。我不同意上述这些说法。

人们可能很难想到，早在文革刚结束的 30 多年前，一些年轻的思想者，文革的参与者就曾讨论和争论毛泽东、文革与中国民主之间的关系。晋君于 1979 年在《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中说：“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王希哲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毛泽东鼓动群众攻击现存的党政体制，说明他站在群众一边，为他们争自由、争民主，说明毛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摧毁官僚特权。他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说：“毛泽东的反动之处恰恰在于，他不满意这个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已经达到的专制程度和集权程度，他要求更加专制和更加集权，而党内的民主改革派阻碍了他的这一企图，这一阻碍严重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危及到了他继续骑在这个党的脖子上号称主席的前途，于是，他才下决心冲击这个党，粉碎这个党，建立一个毛泽东法西斯党”。毛泽东不能以党内合法斗争手段清除反对派，“除了欺骗人民，利用人民，别无他法。而要欺骗人民，就要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蔽起来，粉饰起来。于是，毛泽东告诉人民，那些反对派们都是一些很坏的家伙，是一些官僚，他们一上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反对派打倒而让毛泽东永远在台上。理论上这就叫做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除了毛泽东之外再没有别人了！”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有追求民主与法治的目的，而是恰恰相反，那么，怎么解释文革之后的民主运动呢？

可以这样说，它是文革发动者为了施展争取群众的策略手段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当毛泽东自以为得计地把群众动员起来打倒自己的政敌时，他低估了群众的

智慧，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最喜欢用这句话来奚落政治对手，这次是用到了自己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鼓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揭发和批判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虽然本意是要揭发这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但给人印象最深的，人们热心地口耳相传的内容，主要是官员们利用职位搞特权、谋私利的行为，还有就是所谓“生活作风”问题即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这种揭露始而使人震惊、令人气愤，继而使人联想到党组织、政府的问题，个人的贪腐暴露的是制度的阴暗面。文化大革命使党大大地失去了威信，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伤害，它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开启了政治上觉醒的第一步。

毛泽东和文革派为了争取群众，证明他们代表的是“支持和保护群众的革命路线”，而其对手刘少奇代表的是“压制和反对群众的反动路线”，把现存制度中最压迫人的、最招人憎恨的部分挑出来加以攻击，把账算到刘少奇头上。比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说，档案制度是很不合理的，档案像阴影一样追随人的一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的头上，让人生活得胆战心惊。人们永远不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档案袋中到底装了些什么，也许是告密信，不管是否属实，你无法声辩和澄清；也许是上级给你作的鉴定，不管是否公正合理，在决定前途、升迁的时候，是别人对你的判决，而不是你本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你的命运。又如，江青、陈伯达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成员”，对他们起来对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造反表示支持，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表示同情。这些人是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干活，工资低，劳动保护条件差，没有正常的福利待遇。这些“革命路线”的代表当着最弱势的工人斥责在场的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官员，骂他们做官当老爷，毫不关心劳动者的疾苦，承诺要彻底改变压榨人的劳动用工制度。掌权者没有把自己的承诺当真，但受压制的群众是认真的，他们不管掌权者事后怎么做，自己下了决心要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盛行“防修反修”（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和“兴无灭资”（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方针，做得非常过火，但物极必反，文革使得极左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一些人是大大地动摇了，对一些人则是破产了。文革后人们热心欣赏和追逐的恰恰是与文革相反的东西。与文革中的禁欲主义相反，人们醉心于欧洲 18 世纪充满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艺术作品，与文革中的阶级斗争学说相反，人们沉迷于轻松的、有人情味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而在政治上，则是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

毛泽东出于打倒政敌的需要，大打民主牌，“大民主”成了他争取群众的手段，但事情还另有一面，人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实践毛给民主规定的内容（打倒“走

资派”），同时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价值。当毛从魔瓶中释放出“民主”这个妖怪，以为它会永远当自己的奴隶时，他实际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将它再收回瓶中了。长期以来，在共产党体制和传统专制文化双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心中，很难得到公开的表达和肯定，而文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民主”成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被广泛言说。毛泽东的本意是先“放”后“收”，“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结果是只有天下大乱，没有天下大治，或者说，当他搞成了天下大乱还没有天下大治时，他就撒手人寰。整个国家长久以来是一部结构严密、运转有效的专政机器，文革结束时这部机器已经故障累累，转动不灵。

文革使人们经历了一次斗争的洗礼，人们不再胆小怕事，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文革这场复杂、曲折的政治运动使人感到被批判、斗争，被孤立、恐吓，甚至被抓捕，也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情。文革后涌现出众多的“民运人士”，表现出不怕镇压、打击的勇气，坚持到底的决心，其中多半是在文革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文革还有一个重要后果，中共党内少数思想比较开明，有一定民主意识的领导人鉴于文革的惨痛教训，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中国要走民主化道路，以避免文革再度发生。党内一些资深的知识分子如黎澍、于光远等，更是大张旗鼓地呼吁民主。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主张思想战线上要反对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专制主义）。他说：“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主义所造成的种种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在文革结束，中国民主运动刚刚萌芽的时候，中共党内民主力量对民间民主呼声的回应，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支持。事实上，体制内的民主倾向，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

【阅史漫笔】

## 晚霞消失之后的正义

徐友渔

30年前，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引起轰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最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北岛等人编的《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其中多篇回忆提到当年四中学生刘辉宣（即礼平）的这篇小说，还收录了他本人的文章。这使我再次把《晚霞消失的时候》找出来细细品读，我深感，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争论反映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

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表达的主题是，对于人世间的冲突、痛苦，对于过去的不公不义，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以尘世的善恶是非标准来评判和追究，用超脱出世的宗教情怀淡然视之更为根本。这个故事讲的是，出身于中共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李准平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成了红卫兵头领，在抄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发觉他还面对这个将领的孙女南珊，而他前不久与这位容貌、教养、风度俱佳的女学生邂逅相遇，双方萌生了爱情；当被悔恨和旧情折磨了12年的李准平突然与南珊意外重逢时，李急切地祈求宽恕：

“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吗？……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她真诚地看着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谢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

这么轻易的宽恕并不是李准平所希冀的，这不符合他“忏悔—解脱—求爱”三部曲的预想，但南珊下面的话使他相信，忏悔真的是没有必要：

“破坏的，可以恢复；撕碎的，可以弥合。你以为那样一次冲击，就能使人永远不息地悲伤下去吗？”……

我已经看出来，虽然我自己的情绪从那次抄家以后就一直陷入痛苦的波澜中，可是南珊却在第一次冲击以后就镇静了下来。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

读完《晚霞消失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它并不反映受虐者的心声。确实，如果天下的受害者都像南

珊这么宽容大度，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呀！这种受害者的逻辑是：你做了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你做了坏事，但那是为了你的理想。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境界提升到了哲理与宗教的高度，他们早已不在意尘世的是非和恩怨了。曾经的作恶与施虐者多么巴望这样的逻辑成立啊：我不必忏悔，因为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

但是，这样廉价的解脱难道不是只在虚构的故事中才有吗？这是真正的、应有的宽恕，还是施虐者一厢情愿的自我宽恕？

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来看，这篇小说不过是重复了古今中外史诗或其他叙事的老套：征服者不但要奴役被征服的敌人，而且还要占有他们貌美的妻女。礼平的不落俗套之处在于，胜利之后的占有没有成功，也许，这是因为征服者只有强大的武力而在精神文化上是低下的；也许，这就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和有价值的地方：曾经的征服者-野蛮人感悟到了文明的内在力量。

总的来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想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是，作者认识的局限和缺乏足够的反思，作者力不从心地追求忏悔所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使得这种忏悔像是在做表面文章，使得忏悔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根据小说，主人公具有强大的忏悔冲动，但是，读者可能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施虐者伤害的是自己的心上人，这妨碍了他获取爱情。另外，施虐的直接对象是曾经与自己父亲地位相当的敌对阵营的将军，而主人公多少知道，在统治阶级成员之间，在贵族之间——哪怕他们曾经敌对，有战胜者和失败者之分，还是有一定的规矩与礼节的，他对政协旧将领的虐待与羞辱实际上会使自己的父亲丢脸（不是不正义而是不优雅，违背了“优待”的承诺，有损“宽宏大量”的形象）。主人公-作者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人暴行的认识，停留在“这违反了党的政策”水平上。作者在《暴风雨的回忆》中回顾 1966 年 9 月北京红卫兵对社会上另一部分人的暴力行为时，就是另一种心态和口气：“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泻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究竟打死多少齷齪之辈，谁也不知道。”我感到震惊的是，这话是在事发之后近半个世纪回顾与反思文革的今天说的！

在上世纪 60 年代（也许还在更广阔的时间段）的中国，人们在政治上被划分为领导阶级和“群众”，而群众在政策上被区分为可以依靠的，可以团结的和应该打击的。打击了应该团结的人，这是“违反了党的政策”。《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今天还是在“党的政策”这个层次思考。而从宪法、法律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看，任何人的权利和尊严都不容侵犯，这与人们的出身、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无关，与他们的过往历史，是否有“劣迹”无关。

反思过去的不幸与痛苦，人们可能达到各种各样的层次，在小说作者看来，宗教的、形而上的层次是最高的。中国人腾挪躲闪的功夫一向了得，禅宗也很普

及，轻轻松松就可以上升到宗教与形而上层面。但问题在于，据作者的描述，在这个层次除了减轻受伤者的忿怒、仇恨与创痛，达到超脱境界外，还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线，淡化了恶行本身，卸下了作恶者的责任。对于文革中的抄家、打人和打死人，我们常见的是反思和批判是从政策角度、道德角度，也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提供的宗教与形而上角度，法律的角度不是缺位，就是罕见，而这个角度却是最基本和首要的。

施虐者自我宽恕的说辞不但在社会上有市场，甚至得到了受虐者的响应，这真是咄咄怪事。刘辉宣在《暴风雨的回忆》中说：“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学校，校长和老师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很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没有批斗过老师，更没有打过老师。”他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作者都讲了发生在校园中对师长的殴打和人身侮辱事件。《南方周末》在2010年11月4日报道，在44年之后，终于有红卫兵站出来对被迫害的师长道歉，这罕见得几乎就是孤例。然而遗憾的还不仅是这一点，被道歉的师长们不但不讨论和分析当年的虐待与暴行，反而回避，他们纷纷对曾经施暴的学生说：“你们都是好学生”，“孩子们都很优秀”，“你们也是受害者，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巴金在晚年反思文革时不断被一个问题折磨：“为什么那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夜就从人变成了兽？”这是一个天真无知的问题，从人变成兽不是一夜的功夫，而是长年累月喝狼奶的结果。巴金和那些采取回避态度的校长老师们没有想到自问一下：“我是否参与了对孩子们灌喂狼奶的工作？”而想到下面这一点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思考能力：也许，文革中受虐的校长、教师得到的正是他们自己种下的苦果。当然，主要的原因和责任并不在他们那里。

幸好，以前的教育者中还是有人想到了这一层。《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说：“当时受到迫害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的校长万邦儒，曾在90年代反思检讨过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怀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关。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在压力下，清华附中的校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还单独给他们开会听政治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和所谓‘培养接班人’，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待遇。文革开始，这些高干子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了大规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为。”

由于缺乏反思，缺乏直面历史和苦难的勇气，过去的一页被匆忙地翻过，但过去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以新的形式存在。

北岛在《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中也收入了自己的文章，他说：



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

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当今的事实证明，反血统论烈士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仅仅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

结论：我们的文化道德观是需要改造的。

---

【阅史漫笔】

## 如何道歉，谁来道歉？

徐友渔

宋彬彬在表示道歉和感谢的见面会上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很奇怪。在我看来，公开的道歉和说明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应该早很多，很多，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她本人年近 70，有的受害老师快 90 岁了。正因为太晚，才使一些不确实的说法长期流传而得不到纠正，才有那么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宋彬彬说的话有两个方面，一是道歉，二是辩解，而且真正的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可能有人会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或责难她的道歉行为。我认为，揣测动机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我更想强调，道歉时可以做出说明和辩解，因为我们的一切评论和判断都必须基于事实。宋彬彬尤其有权利、有必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作出说明，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关于她本人，关于她和卞仲耘之死事件有许多传言是不确实的。如果一个法庭不允许被告申辩，那这个法庭一定不是公正的，它作出的判决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宋彬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传言，有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比如，有的说她亲自参加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事件，还有的说她亲手打死了好几个人。我在自己研究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过这种材料，这种误信、误传不实信息的做法可能扩大对于当事人的伤害，我在此向宋彬彬女士道歉，保证再谈此事时不再重复不实之词，并作必要的澄清。

根据宋彬彬的这次发言，以及以前发布的材料，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宋彬彬不属于对卞仲耘殴打致死的凶手，她也没有在其他场合亲手打死人，长期流传的

类似不实说法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基于这些传言对宋彬彬的批评应该停止。至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责任，她的名字被改为“宋要武”所产生的恶果，还有她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和评价，那当然还可以争论，也一定会有争论。但是，一切争论，一切不同的看法，都必须基于事实。

我记得，几年前当我读了刘进关于打死卞仲耘的“八五事件”的材料和其他有关材料之后，我马上就作出判断：说宋彬彬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的事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还写了一些文字，对于以前传布不实说法表示纠正和歉意，并同意办网站的朋友发表。以我的经验，不论传言多么久远和广泛，不论人们的偏见有多么深，事实本身还是最有力量的。我为这种澄清来得太晚遗憾，我相信，如果调查材料及早公布，哪怕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一面之词，会引起争议，但至少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会深思、比较，采信正确的说法。

我希望，所有研究和叙述文革的学者、作者，一切有关问题的写作者，都重视宋彬彬本人和刘进等人的澄清与说明，如果有过对于北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不符合事实或不准确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坚信，这种更正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对于文革真正责任者的追究，但对于宋彬彬本人，却影响巨大，不管你对她抱有好感还是恶感，即使你不想对她本人的处境和声誉负责，你也必须对事实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

事实是最坚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个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欢，他说出的事实仍然是事实；一个说法，哪怕它充满道义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说话，如果不符合事实，仍然没有说服力。正义感不能代替事实或弥补事实方面的缺陷，反而会因为与事实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我不愿意看到，这次宋彬彬等人对于事实的说明和澄清演变为对于以前控诉和批判文革中暴力与迫害的质疑或否定。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以前的指控是建立在歪曲事实和谣言的基础上，有关研究者的指控是出于对于宋彬彬的个人成见。如果说宋彬彬曾遭到污名化的委屈，那么事情起源于把“要武”这个恶名强加于她的文革发动者。“要武”与全国性的武斗和暴力事件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号召“要武”，文革发动者还命令军队把武器发给一派群众组织，以剿灭另一派，还说什么中国“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顶着“宋要武”名字的宋彬彬当然与全国性的武斗没有关系，但既然领袖把这个名字赐予她，也就使她摆脱不掉地成为武斗的象征和符号，要怪只能怪把这强加给她的个人和体制，而不能怪群众。如果宋彬彬不敢或不愿正视、谴责最高领袖对她的污名化与伤害，把怨气集中撒在致力于揭露和批判文革暴力的人身上，那么她的说明就难于奏效，还会激起反感，维持和加深对于她的已有误解，这对她本人和中国人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都没有

好处。

宋彬彬终于公开道歉了，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她的道歉引起了关注和议论，但人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快、最本能的反应是：谁最应该道歉，谁是最有责任道歉的主体？

显然，这不应该只是单独的、普通的个人，不管他们在文革中怎样做错事或作恶。至今为止，道歉者都是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那么，对于发动文革应该承担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呢？要知道，文革是在隆重的会议之后，根据会议的正式决议进行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有过对于文革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但这与道歉是两回事。

我们知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是如何为二战道歉的，我们更知道，我们是如何要求日本领导人对中国道歉的，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仅有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够吗？

---

【生逢乱世】

## 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

徐友渔

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蓦然回首》第三章《峥嵘岁月——1967 年》，该书于 1999 年 2 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本刊转载时作者略有修订，现标题是作者另拟的。

### 参加造反派组织

串连之后回到成都，当务之急是要投入火热的斗争。既然已经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以前那种游离于运动之外的状况，是结束的时候了。

在北京时，得到了一份材料，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关于两个多月以来文革运动的总结。他在其中讲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把 1966 年 8 月份以来流行的“自来红”思想和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划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指出，这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腐朽透顶的思想的翻版，是血统论。他还指出，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就是在文革运动中制造混乱，提倡这些荒谬论点的人是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

学习了陈伯达的讲话，觉得头脑豁然开朗了。原来流行的那些令自己反感的東西，那些毫不讲道理的东西，果然是错的！而且，制造谬论的人是为了压制广大群众起来革命。回成都后，得到了陈伯达讲话的铅印本，这是中央的正式文件。我们这时深切体会到了，为什么报纸上常常强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原来，那些吓人的革命口号，那些左得可怕的东西，并不是毛主席支持的。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感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此亲切。

我和闵从陈伯达的讲话中受到启发，认识到提出对联（这时已被称为“反动对联”了，形势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轻学生固然有错，但血统论（这时也被称为“反动血统论”）之所以那么猖獗，流毒如此之广，原因恐怕在于有掌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文革运动。因此，清算文革中的反动路线不应该向同学翻旧账，而应该挖出根子。

我们两人到处奔走，到西南局、省委、市委去看大字报（这时形势已经大变，各级党委中的党员和干部纷纷造反，揭发当权派的问题），同时找原工作组的负责人和队员了解情况。我们果然掌握了大量材料，说明西南局、省市委中某些人暗中大力支持散布和推广血统论。我们写了一份长长的文章，油印散发，公布了我们的结论。

一天，闵拉我去成都北郊的一个铁路工人俱乐部参加一个讲演会。主讲人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他串连到成都，作煽风点火宣传，即号召大家起来造当权派（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他在成都已经作了很多场讲演，唤起成千上万的人起来造反。他在成都名气很大，深受工人拥戴。

我本来并不特别重视他的讲演，但很快地，我被他的演说深深打动了。与我预料的相反，他并不讲理论和当时流行的大道理，而是用极其普通的语言，从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和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一件件事情入手，揭示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存在的毛病。根本问题在于，现在制度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机制，使得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地压制群众。他们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以阶级斗争为幌子，动辄就把给他们提意见的人，与他们有利害冲突的人，他们看不惯的人，打成反革命。一个人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而被当权者在档案中记上一笔，从此就永远不得翻身，每次运动一来就首当其冲，成为靶子，多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举了大量的例子，这些事例都从工厂、学校实际生活中得来，每个人凭自己的经验都知道它们是真实的。他向听众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说在我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吗？那些当官做老爷，整人害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难道是人民的公仆吗？

讲演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参加听讲的人越来越多。我周围的工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纵横，他们最后绝对听讲演者的号召：起来

造“走资派”的反，把中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社会。

如果说，陈伯达的讲话使我对文革开始以来几个月中种种疑惑有了清楚的认识，那么可以说这次讲演使我对于十多年来生活中种种难于解释的事情有了明确答案。多年来，我们被告知，中国人民生活在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之下，但现实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被告知，党是绝对正确的，但人们看到有些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却在玷污着党。人们从经验中直觉到什么地方有问题，有毛病，但有些领导人以自己的权威，以自己的宣传机器让人们相信，错误不在现实生活中，而在人们自己的头脑中。对现实的批评、怀疑，甚至哪怕是信心不足，都是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在作怪，应该改变的只是自己的思想认识。人们多年来一直以党的权威和革命理论来抗拒生活经验，甚至抗拒自己的亲身遭遇。现在，这一层纸一下就给捅破了。原来事情如此！其实事情早就如此！思想上的枷锁一旦去掉，人们的良知、价值标准和经验事实马上一致起来。那些自我反省，那些自我怀疑和否定，通通都是受骗的结果。人民要真正做人，这既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代表的真理。在当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恰恰被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印证了这一点。自运动开始以来，工作组在群众面前表演得十分充分。他们和单位的党委沆瀣一气，整群众的黑材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他严厉警告说，凡是镇压群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66年底，各单位都传达了中央一个规定，该规定同意中央军委前不久发出的一项紧急指示，要求对被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学生一律平反，整他们的黑材料一律当众销毁。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许多人真正认为，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了自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感到站在群众一边的党，而不是压制群众的党，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我自己也深切体会到，在把保护群众、支持群众的种种做法归功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后，我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将与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意识形态完全弥合。我的理想将通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实现，在党的这种新形象面前，以前的困惑和疑虑统统都扫除干净了。

看起来，参加革命造反不但势在必行，而且义不容辞。但在串连回成都之后，我发现革命造反派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正在激烈展开宣传攻势，争取人心。我选择哪一派的组织呢？

成都市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紧紧依附于大学生红卫兵。每个大学都在中学发展自己的势力。成都市原来有一个统一的造反派组织，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由成都市十多所大学中运动初期的少数派，即反工作组的学生串连在一起组成。

随着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派红卫兵势力越来越小，造反派声势越来越大。但是在1966年11月13日，这个组织发生了分裂。

这就是成都地区文革史上著名的“一一·一三”造反事件。原统一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在11月13日开一个批判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而官方也希望有一个场合让李公开检讨认错，不然他会被说成是坚持错误，对抗运动。于是在政府协助配合下，批判大会如期举行。但会议正在进行时，这个组织的川大支队，即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一些人却突然冲击主席台，使大会无法进行下去。他们说这个大会让李登台亮相，实际上起到了假批判、真包庇的作用。他们造了“一一·一三”大会的反，而其他十余个学校的造反派则谴责他们的破坏和分裂行动。从此成都地区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川大“八二六”，另一派是除川大之外的所有大学，仍然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一般人的印象是，川大“八二六”的政治倾向更激进，而“红成”则稳妥和温和一些。

我不喜欢“八二六”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政见，可用毛泽东的一句著名格言概括其基本精神：“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尽管当时四川和成都地区保守派已经式微，从西南局、省市委到各级领导已经瘫痪或半瘫痪，其主要负责人被认为是黑帮，正急于检讨和自我批判，但这一派仍然认为运动的主要方向是继续把局势搞乱。他们认为四川还没有乱够，没有乱透，只有透底烂掉，最后才会有好结果。而任何温和的、按部就班的方针都是右倾、调和、搞折衷。当然，我在选择组织时还是十分慎重的。我到各个大学去了解每一个组织的观点。当我去川大时，刚巧那个负责接待的人水平不高，而且有一个“红成”派的人正在巧妙地诘难他。他穷于应付，张口结舌，漏洞百出，使我对他所属的组织印象不佳。大致就在这时，我作出了选择。

正巧，我的同班老友L来拉我参加本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旗野战兵团”（简称“红野”），他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可能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宜作负责人而辞去勤务组（那时为了表示与旧体制划清界线，并表示领导只不过是群众的勤务员，任何组织的领导班子都称为勤务组）内职务，但仍保持在该组织中的元老地位。“红野”与我校其他造反派组织不同，它与大学红卫兵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观点倾向于“红成”，但其中有不少人也倾向于“八二六”。我对这个组织比较中意，就决定参加。该组织第一号勤务员马对我表示欢迎。并举行了一个宣誓仪式，我就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了。

我校有一个川大“八二六”的分团，其核心就是在写信事件中最早造反的那批同学。他们文革前基本上是团干部和班干部，又有最早反省市委、受工作组打击的光荣历史，因此自视甚高。与保守派固然势不两立，对其他人也看不上眼，

大概认为别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惟独自己最革命，他们一直甘当光荣的少数。不论从理论取向上还是从人际关系考虑，我都不会参加这个组织。

大约在 1967 年初，我的好友许（我曾与之进行人生观论战的那位小学同学）叫我和闵去参加一个中学生的串连会。会议发起人是胡（他后来成了名人），一个和我们同年的中学生。他正在办一份铅印报纸《中学红卫兵》，近期目的是批判血统论。第一期已经出版，主要内容是转载北京遇罗克的轰动一时的文章《出身论》。这篇文章写得极好，立论严密，文采飞扬，说理透彻。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由同龄人写出，引起我佩服的文章。胡为他办的报写了一个发刊词，也写得很好，思路清晰，文锋犀利。他邀请与会者和他共同办好那张报纸，我欣然同意。

但是，闵偷偷拉我到一边去，劝告我应对此事持慎重态度。他认为办报纸是件非同小可之事，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我们的认识能力有限，对重大问题发表见解，还没有把握。万一犯了错误，后果就严重了，因为一张报纸会有许多人阅读。我们只应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办报这种有深远社会影响的事情，应三思而后行。我又被他说服了，我们把胡叫到一边，对他讲了一番社会责任、社会后果之类的道理，并表示了我们的保留态度。胡倒很宽容，没有表示失望，也没有勉强我们。

这是又一次，我追随了一种肤浅的主张。闵确实比较胆小怕事，另外，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家，但对理论没有多大兴趣。不过，我后来从胡的报纸和许借给我的材料中，读了遇罗克的所有文章。

许家庭出身并不差，他决不是为了实际目的才喜欢遇罗克的文章。他后来专程去北京，想拜见遇罗克。但遇罗克已经被捕，他们的报纸被查封，编辑部被洗劫。许在北京认识了遇罗克的一些朋友，了解到许多详细情况。他告诉我们，遇罗克是一个比我们几岁的青年工人，他在学校时学习、品行极为优异，但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考不上大学。他勤奋自学，平时在门上贴一纸条：“来访者谈话不得超过 10 分钟。”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刻苦，他终于在历史和文学方面达到博古通今的水平。他胸怀大志，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血统论猖獗之时，他发表了《出身论》《谈鸿沟》《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受到北京市的学生和工人的热烈欢迎，为大家争相传诵。这些文章还流传到全国各地，人们认为它们说出了自己久已想说而不敢说，或说不清楚的话。遇罗克勇敢地 and 血统论者辩论，那些人辩不过他，就大打出手，靠封别人的口来掩盖自己理屈词穷的窘态。许还告诉我们，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等人曾宣称遇罗克的文章是“反动的”，攻击了党的阶级路线。他被判处死刑，除了因为写文章批判血统论，他的日记也成了定罪的依据。遇罗克是文革中为真理而献身的最早的殉道者之一，他的死是我重新思考文革和现实政治体制的一个动因。

## 夺权

初入组织，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刺激性。

兵团的第一号负责人马，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办事老成。他之所以当上勤务组组长，可能是因为相比而言他的家庭出身算最好的。我很快就认识了其他战友，他们中不乏有个性、有魅力的人物。

一天晚上，我与匆匆从外地赶回来的陈见了一次面，作了一次长谈。我早就知道陈是我校一位知名人士，他念高二，比我低一届，论打架，他是一把好手，论写文章，亦属上乘。他的文章极为生动、尖刻、辛辣，人人看了都会拍手叫好。他和我畅谈成都地区“文革”形势，从战略和战术方面分析敌、我、友各方面的态势和意图。他讲得头头是道，一副军事战略家模样，我听得也很兴奋。陈在同学中很有威望，周围有一大批人与他要好，但他从不谋求勤务员职位，虽然对于兵团的大政方针他有很大的发言权。我后来发现，造反派队伍中有不少像他这样的人，一般被称为“实力人物”。他们之所以不抛头露面当正式头头，大多数情况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允许。也有人出于谨慎，中国有句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还有一句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们愿意为自己留条后路，以免运动后期被“秋后算账”，或树敌太多而遭到攻击。但陈可能不属于这种情况，他敢作敢为，从不怕事。他不当头头也许是性格原因，他不耐烦日常的、琐碎的行政管理事务。他是天生的造反者，他决不站在官方一边，即使在造反派队伍中，他也远离“官方”位置。

参加组织之后大约一周，马叫我随他去一趟灌县。灌县离成都 55 公里，著名的避暑胜地青城山就在此县境内。“红野”有一百多人，主力完全放在灌县。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学校空空如也，学生下到各专县或工矿企业，去发展或支援那里的工人组织，支持的当然是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派别。“红野”的成员以高中生居多，他们较有头脑和能力，初中生则个个干劲十足，对组织忠心耿耿，因此，这个组织很有战斗力。

当时，下面各战斗队和许多战士，抱怨兵团头头有官僚主义作风，不深入实际，高高在上，遥控指挥。他们批评有一个头头专门出风头、图享受。说他好走上层路线，乐于与高级干部打交道，进出与他们同乘小汽车，甚至坐飞机。这件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有些高级干部已经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比如四川省监委书记梁歧山，很早就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打倒李井泉。他曾到我校作过表示支持造反的报告，接待他的那位头头坐了他的轿车，后来还因办什么事与他同乘飞机。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批评，马决定去一趟灌县。



正是那位广有交际、被批评得最厉害的头头，从一个工人组织那里调来一部吉普车，他、马和我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灌县。我们刚一下车就引起大家的不满和批评，因为坐小车是一种享受特权的象征。马广泛听取意见，座谈会持续了几天，听到的全是一片批评之声。马作了自我批评，最后还作了一个决议，将在全兵团开展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以免使自己从革命派转化为对立面。我对大家的觉悟大加赞扬，几次发言，强调在革命的过程中要注意自身革命化。大家因此对我有好印象，责成我负责办一份油印小报，专门监督组织内部思想和行动的纯洁性。

刚从灌县返回成都，就遇上了从上海掀起的“一月夺权”风暴。

1967年初，“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在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战略部署，我们很不理解。就四川运动形势看，这是很不现实的。那时，保守派的气焰被打了下去，但他们仍有组织活动，正是所谓的“人还在，心不死”；造反派的派别斗争正趋尖锐，根本谈不上联合。而且，当时还没有说要依靠原政权中的“革命干部”，一大帮毫无经验的学生，再加上为他们所左右的工人，怎么掌权？

在去灌县之前，我因看望一位同学，偶然旁听了一次大学红卫兵组织预备夺权的情况分析会。他们完全承认，在四川实行联合夺权的时机并不成熟。但他们强调，既然中央发了号令，就应该行动。而且，他们十分担心，如果自己书生气十足地不采取果断行动，万一其他组织夺了权，自己就被动了。因此，他们决定不顾一切，夺了权再说，在夺权过程中加速实现大联合。他们考虑的是夺省市一级的权，即派一些人进驻省市委和政府部门，接管权力。

我从这次会议中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形势，但学校中仍在酝酿夺权。一般而言，在每个学校中，有4个组织有资格参与夺权，即“红成”派的学生和教师（包括其他职工）组织，以及“八二六”派的学生和教职工组织。在我们学校，事情很好办，因为两派并不十分对立，而且对于权力均不感兴趣，不会争权夺利。只是感到应该响应中央号令，大家才认为有夺权的必要。几个组织的头头一商量，决定立即在本校夺权。这时学校没有什么人，学生全在社会上活动，不存在行政管理或教育革命等问题。因此，夺权只是去学校党委秘书那里把印章拿过来。那个秘书没有任何抗拒，顺从地把校印交了出来。

大家都不耐烦讨论下一步怎么掌权，而是急于回到社会上去活动。但毕竟有一个问题：虽然夺权是联合行动，但总得有一个组织管这只印。可能因为“红野”人多势众，更主要是大家推来推去，而马最好说话，最后决定由我们管这个印章。马把印接过来，顺手就交给了我。作为刚参加组织的下属，我不能拒绝。我心中叫苦不迭，这印章可不是一般的東西，它可能惹祸的。

从此之后，我挎着一个装有印章的背包，好不紧张。我已经是革命造反派，在运动中理应无所畏惧。但是，我想干的决不是执掌这个印把子。而且，心理上的障碍不但存在，而且很严重。那些“红五类”不是口口声声高叫要掌权吗？我这样的人管印，岂不是犯了大忌？

我千方百计想办法推掉干系。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我终于将这只印章交给了教工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他是学校烧锅炉的工人，他拿着这玩意儿显然更合适。所幸的是，工人毕竟头脑简单一些，我费了一阵口舌，他终于把印收下了。果不其然，到了所谓“二月逆流”保守派“复辟”时，他被攻击为有野心，要篡权。幸亏他是工人，免于被严厉追究。

我管理这只印章时只做过几件事，主要是外省几个接待站发电报来查询，说我校有学生仍在外串联，他们声称身无分文，只好向当地借钱借粮票，别人怀疑他们是在诈骗，要核实其身份。还有人在外地做了坏事被抓，公安机关来电查问并征求处理意见。回复电报以单位名义发出，需加盖公章。对这些事情，我都严肃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用自己的钱交付了电报费用。

2月10日左右，几个工人模样的东北人乘一辆大卡车来到我校，找到我和马，要求我们去他们那里研究形势，指导运动。原来，他们是四川西北部深山密林中的一个三线建设单位的职工，那里的群众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和武斗，他们来请我们去做主、评理。三线建设是毛泽东提倡的，他在60年代初认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为了准备打仗，他下令把中国的军事工业从东北和东南沿海工业城市疏散、迁移到西南偏远地区。于是有千军万马告别故乡亲友，开到那些穷乡僻壤或人迹罕至之地。

想起来都十分可笑，来找我们的人年龄比我们大得多，他们走南闯北，见识和阅历远远超过我们。只因为毛泽东把我们封为革命先锋，他们就把我们当成先知先觉，当成裁判和法官。他们当地发生了争斗和纠纷，相持不下，搬我们去评理。他们诚恳表示，尽管他们一肚子委屈，但准备完全听我们的，我们说哪一派正确他们都服气，我们说运动该怎么搞他们就照办。

却不过他们苦苦相求，马和我，还有两个川医学生，坐上他们的卡车出发了。我们从前挖苦嘲笑北京来的学生，说他们是“救世主”、“太上皇”，这次我们是不是也去当救世主和太上皇？我们四个人决心谦虚谨慎，深入调查研究，不辜负工人同志们对我们的期待和信任。

我们在那里住了四五天，不但和请我们去的那些工人，而且和对立派的群众作了大量谈话，终于形成了我们的调查结论。这里的情况在四川颇具典型性：一大批东北老企业的技术工人来到这极其荒僻贫穷的地区，他们工资高，又有三线建设津贴，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形成巨大差别；他们思想正统，把党组织的

领导奉若神明，毫无造反的要求和心理准备；他们瞧不起当地工人，那些人穷得像叫花子，许多人本人或家庭有历史问题，对于现实心怀不满。运动一来，自然形成两派，在本单位，他们不论在人数上还是组织上都占绝对优势，但整个单位却在当地势力的包围之中。他们认为对方组织不纯，里面有阶级敌人。双方不知为什么发生冲突，对方纠集当地其他单位势力向他们进攻，占了优势。当地人抓了他们之中的骨干，强行令其跪在地上，嘴里塞上狗骨头，叫做“向毛主席请罪”。他们对于这种人身侮辱恨之入骨，满心以为自己占理。

我们很清楚全国的形势，从政治上看，他们是保守派，不管他们的组织多纯，他们终将在政治上遭到失败。我们实在不愿意告诉他们，从政治路线上讲，他们是站在错误的一边。我们是他们请来的，和他们相处几天之后，我们由衷地喜爱和尊敬他们。他们为人正派、纯朴、诚恳，他们离开家乡，来到这穷山恶水之间工作，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不告诉他们形势是怎么回事，他们以后会犯更大的错误。为他们好，我们只能以实相告。我们极费踌躇地商量了一个声明，由我执笔完成。我们竭力向他们说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并说明他们这里地处偏远，运动开展得晚，有一些特殊原因妨碍了他们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后希望他们不要抓住对方组织不纯以及揪斗人的缺点，在政治上和对方一致，团结起来，把文革进行到底。

为了他们好，我们竭尽全力宣讲革命造反的道理，终于有三五个人被我们说动了。我们将声明张贴出去，这些诚恳而热情的朋友以失望和哀怨的目光注视我们，我们赶紧离开了那里。

这里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奇贵，走时我们发现，短短的几天，我们带来准备应付半个月的生活费全用光了。

我逐渐习惯了当一名造反派红卫兵，但有的人还不习惯我这种新身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学校中的保守派红卫兵知道大势已去，不再活动，不再戴上他们自己的袖套。我发现有人看见我居然戴着红卫兵袖套在学校走来走去，常常以一种特殊的目光盯住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没有任何心虚和自卑感，我深感自己在道义上的优越，这种优越感不仅在于，我未像他们那样打过老师和同学，也不仅在于，我现在站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一边，而他们错了，已经由党中央明确地肯定为错了。我知道，人免不了犯错误，你今天正确，但说不定以后就会犯错误。我的优越感主要在于，我始终把追求真理放在第一位，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有错误并随时打算改正。但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错误的心理机制，他们从来都只革别人的命，一旦自己错了而且错定了，就心怀不满，消极颓废，放纵自己。另外，我判断形势，衡量对错，从来都不是从一己私利出发。而他们在运动中所想的，所追求的，除了权，还是权。我在他们身上，除了看到贪婪的

权势欲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我知道他们心中希望我有一天也犯错误，那么他们将卷土重来，再次趾高气扬。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充满自信，我会随时严格要求自己，犯了错误也会马上改正。决不会像他们那样，让私利蒙住自己的眼睛。

## “二月镇反”

年初的夺权活动，虽然被称为“一月革命风暴”，但并未在全国形成大气候。只有上海、黑龙江等少数省市成立了得到中央认可的所谓“新生红色政权”。其余地方的夺权，要么是未得到中央承认，要么只是由不同派别分别抢去几颗图章，连自己都知道算不了数。这样一个不知道会怎样收场的过程，给所谓“二月镇反”打断了。在四川，形势骤然发生逆转。

四川地区的“镇反”，在全国是突出的事件，起因是造反派在成都军区门前搞静坐示威。

文革开始时，中央有明确规定，部队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但部队的院校及文艺团体则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历来重传统、讲纪律，而军队领导又不像地方领导受到群众冲击，因此，军内人数不多的造反派处境十分困难。年初时传闻成都军区抓了一些军内造反派，川大“八二六”和同派的工人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力声援他们的战友，要求成都军区领导放人、认错。军队态度强硬，造反派也不服软，他们在军区大门口静坐示威，坚持要求放人。

“红成”这一派没有卷入这种活动，他们也许是把中央另一个规定，即不准冲击军事指挥机关放在第一位，他们或许是认为，对于军区领导的错误，可以向中央反映，而不宜公开对抗。

文革运动涉及到军队时，显得十分扑朔迷离。运动初期，军队实行不介入文革的政策。大约在1967年初，毛泽东致函林彪，要求改变不介入政策，他以指责的口气说，不介入是假的，其实早已介入了。毛泽东指的可能是，地方党委为了躲避被整群众追查黑材料（也可能真是为了保护某些重要的档案材料），将档案文件转移至军区保存；有的当权派为了逃避造反派揪斗，也躲进军区大院。毛泽东要求说，军队应该坚定支持革命左派。林彪闻风而动，下令坚决照办，各军区为此成立了“支左办公室”。这之后，军队介入了地方上的运动，他们要宣布谁是左派，予以支持，自然地，他们也要宣布谁是右派，予以取缔和打击。

毛泽东的决定是难以理解的，其中显然有可疑和神秘之处。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派系林立，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利益错综复杂，怎么能确定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支持谁、打击谁？当时能够认定左派的只有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本人，但

他们却撒手不管，让各军区去自行确定左派。军队只看组织成分纯不纯，他们天然地和保守派心连心，决不会支持那些反对和冲击军政领导的群众组织。等他们大张旗鼓行动之后，中央又批评他们支持错了对象，镇压了革命群众。真不知这只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静坐军区达到高潮是在2月上中旬，我曾去看过，军区门前人山人海，几乎把军区全包围了。后来听说，军区司令员已调集了警卫部队严加防范，而且下令，只要造反派冲过第三道门，就开枪射击。

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传来了中央军委致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17日签发的，以“二一七信件”著称。信中明确宣布他们静坐、围攻军区是错误的，要他们立即撤离。这些造反派虽然斗志旺盛，但怎奈命令是中央军委下的，而主持军委工作的是林彪，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显然，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在以后反击“二月逆流”时，林彪声称他从不知道有“二一七信件”，据说那是叶剑英批准的。）

这封信的作用当然不只是劝人撤离军区，它等于宣判了这两个组织（在全省拥有百万以上成员）政治上的死刑。军区马上开始抓人，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的头头以及骨干分子全部入狱，各专县抓人更厉害。“红成”的头头庆幸自己未卷入围攻军队事件，与“八二六”结怨甚深的人还有幸灾乐祸情绪。我所在的“红野”与“红成”总部没有直接联系，而我们去灌县支持造反派时，那里只有兵团一派，与他们相交甚笃，因此对镇反态度抵触。而全川的保守派则一下子翻了过来，他们协助军队抓“坏头头”，揪斗追随者，真是说变天就变天。2月下旬，成都市区内外，只见公路上军车急驶，只听得阵阵警笛长鸣，从车上，从天上的直升飞机中飘落下大把大把的“中央军委来信”，墙上通缉令和声讨书，街上不时押过被抓捕的人。也有少量大字报是川大学生贴的，他们当然不能公然对抗中央军委命令，但又要表达他们不服“镇压”，坚持斗争的决心和意志。他们的大字报内容多数是抄录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公开反对的。在艰苦险恶的形势下，在悲壮殊死的斗争中，毛主席的话语特别能激励人心。川大学生抄出的语录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他们抄录的诗歌特别适合当时的气氛和表达他们抗争的决心：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我曾专门去过川大一趟，看看那里的情况。那天寒风凛冽，校园失去了昔日的热闹，室外很少见人。天上有一架直升飞机作低空盘旋，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大操场飞行，始终不肯离去。我似乎能感觉到它的气浪。看着它吐出无穷无尽的“二一七信件”，我心中茫然。我转至宿舍区，那里稍有生气，不时能看到号召坚持革命信念的大字报。突然，我在一大排窗户外听到一阵歌声传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歌声原意是表达红军战士长征途中在战斗失败时的希望和期待。川大的学生唱得是那么动情，那么悲愤，使我不禁热泪盈眶。我经过一段运动之后，自认为思想上、政治上已经开始成熟和坚定，我明确认识到，我与“八二六”派政见不同，我始终反对把矛头指向军区，但是，这种规模的镇压，决然是不对的。毛泽东一再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军阀，只有反动派才镇压学生。人们都认为他这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我校，对造反派的压制结合军训一道进行。早在1966年底，毛泽东就提出要对学生进行军训（全称是“军事政治训练”）。成都军区决定在全面铺开之前，先以我校为试点，调来一连部队进入学校。部队进校后就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八二六”是右派，原保守组织是左派，“红成”是可以团结教育的中间派，其中个别坏头头要处理。许多军官分头活动，找群众组织头头谈话，找一般学生了解情况。他们警告“红成”派的头头和活跃分子：要认识错误，坦白交代问题。对“八二六”则更严厉，说他们是坦白罪行，反戈一击的问题。

我从没有和军人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密切的接触。以前电影里、小说中的解放军，被称为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笑容可掬，专门给老百姓修路、造桥，担水、磨面，做各种好事。但这一次见到的负责人，却是态度严厉、思想机械，简直难于有共同语言。他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只有一个衡量标准：你家庭出身如何？对于造反派组织，他们认为其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受蒙蔽、被利用的人，另一种人是居心不良，乘运动之机搞阶级报复。当然，一般士兵很纯朴，甚至包括只管军事训练的下级军官，他们不大过问政治。这时全校1200名学生全部返校，军人每天训练我们叠被子、打背包、走正步，当然还有政治学习和讨论。

随着见识的增长，我在行动上也越来越大胆，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叫“猖狂”。“八二六”派被彻底打下去了，但我们毕竟没有静坐军区，还可以与卷土重来的保守派对抗。不论在班上还是在学校与保守派辩论，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说实话，我校的保守派也太不成器了，就是在那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他们也未见得占优势。这主要是一个智力问题，我校一位老师有如下评论：“本校高才生全在造反派里，他们怎么斗得过？”他们写大字报文句不通，刷大标语居然会有错字。此外，他们人数也少得多。有一些在运动初期曾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甚至担

任过校文革头头的同学，后来转向了造反派，而且始终坚定如一。在2月和3月份这种所谓“狂风恶浪”的考验人的日子里，他们一点也不动摇。我很看重他们，因为他们一旦认识到了一种道理，就敢于否定自己，并坚持到底，决不随风摇摆。那段时间，我们当然有压力，但组织仍然存在，大家每天尽量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并不气馁。军训期间，成都军区司令员到我校来作过一次讲话，他严厉斥责“八二六”和兵团，并警告“红成”要迷途知返。

四川远离北京，运动往往慢一个节拍。当3月底这里还在大力镇反时，我们凭着已有的政治敏感和分析能力，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看到，当时不正常的政治形势是由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造成的。为了准备反攻，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我们开始整理成都军区司令员在我校的讲话，并广泛收集军训中的情况。我主持搞出一份材料《成都一中的军政训练》，我们知道它很重要，决定当成机密文件，严加保管，连北京来专门收集成都军区问题的大学生都不给。有一位头头，不知怎么比以前的党委书记还要官气十足，他决定把每份材料盖上印章并编号，严加控制，防止外传。这样，材料一直锁在他的抽屉中，未起什么作用。

当中央号召批判“二月逆流”时，我们全力举行反攻，一夜之间校园内全是我们的\*\*大字报，保守派顷刻之间阵脚大乱，部队再也弹压不住，学校局势形成对峙。到了4月初，反复辟的号角声从北京传来。4月底，“红成”被成都军区封为左派组织。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而略带燥热的上午，全市学生到市体育场集会，听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支左办公室”主任李文清讲话。他代表成都军区正式宣布，成都地区的左派学生组织是“红成”。我未去开会，在学校为同学们准备大量茶水。会后大游行，我校学生经过刻苦操练，以庞大的阵容和整齐的步伐在蓉城大出风头。“红成”总部的头头志得意满，弹冠相庆。

陈不愧是彻底的造反派，他回校之后对我们表示他的不满：“怎么，我们当起官封左派来了？”我们立即分析形势，觉得事情确实不对头。“红成”是左派，“八二六”呢？“二月镇反”到底对不对？左派的桂冠怎么这么轻易就得到了？就我们的性格和自尊心而言，被钦定为左派，并不感到光彩。我们进而认为，拉“红成”当左派，不过是要政治手腕，目的是继续压制“八二六”，掩盖“二月镇反”的错误。

当天下午，“红野”就贴出声明，刷出标语，声称不当官封左派，并呼吁“红成”总部头头和广大战士不要被左派的称号和桂冠迷惑、收买，应当和“八二六”共同战斗。

我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响应和支持，但“红成”当左派的日子也并不长。过了不久，“二月镇反”被中央明确而正式地否定。我们逐渐感到，2月份被镇压的

“八二六”和兵团才真正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左派，“红成”实际上降到被团结的地位。这个过程，我们十分清楚，并对“红成”总部头头的平庸和短视不满。

对于“二月镇反”，“八二六”主张要“全盘否定”，“红成”则主张“彻底否定”，从字面上看两个口号没有什么区别，但其中蕴含了很大的分歧和利害。所谓“全盘否定”，就是说因为政治路线、指导方针是错的，镇反全然错了，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和辩解余地。“红成”反对“全盘否定”而主张“彻底否定”，则暗含这样的意思：镇压造反派固然犯了政治路线错误，但围攻军区毕竟是不对的。而且，抓人捕人从大局上看虽然不对，但被抓的人当中确有坏人，这一点也应肯定。

### “一月风暴”战团的成立

3月初，在镇反还未形成高潮，军训还未正式开始时，我校“红成”派的四个组织决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

现有的四个组织分别是：（一）“红旗野战兵团”；（二）“井冈山纵队”，它是成都大学的“红成”派组织“成大八三一”的支队；（三）“东方红纵队”，它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成”派组织“成电东方红”的支队；（四）“奔腾急纵队”，它是成都中医学院“红成”派组织的支队。这四个组织每支队伍有一百多人，其中第一支“红野”和第二支“井纵”战斗力最强。

合并的过程十分简单，不存在权力分配方面的问题。但如何给未来的组织起一个既响亮，又不俗的名称，却使大家绞尽脑汁。

当时红卫兵组织起名，大至一个地区的组织，一个大学的组织，小至十来个人甚至几个人的战斗组，一般都按照两种方式：一是根据传统的革命术语，如“东方红”、“井冈山”、“红旗”，二是来自毛泽东的诗词。上面所列四个组织，前三个的名称属于第一种情况，第四个属于第二种情况，它来自毛泽东的诗句“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这诗句的最后三个字“战犹酣”，同样是常用的组织名称。

毛泽东的诗词充满革命豪情，加上红卫兵对他极度崇拜，因而成了群众组织名称的主要来源，其利用率之高，几乎每一句都可提供一个名称。例如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其中每一句的结尾，即“送春归”、“迎春到”、“百丈冰”、“花枝俏”、“不争



春”、“春来报”、“山花烂漫”和“丛中笑”，均是常见的组织名称。

成都市大学生的组织名称还有一个特征，它们常常包含一个日期，这往往是该组织成立的日期，或与该组织有关的某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日期，还有就是该校师生集体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日期。比如“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团”、“成大八三一战团”、“川医九一五战团”等等。

革命名称可以信手拈来，但若过于常见，与别人重复，就显得平庸。我们为自己组织的名称讨论了很久，最后有人提议叫“一月风暴”战团，这得到了大家一致同意。我很中意这个名称，它避开了“红成一中支队”这样的附庸色彩。战团第一把手由“红野”的马担任，每个纵队再推举两个头头担任战团勤务组成员。过了几个月，我们接纳了第五个支队“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一中分团”，它是很晚才成立的。

整个学校有学生 1200 人（初、高中各 3 个年级，每个年级 4 个班，每班 50 人左右），“一月风暴”共有战士 600 至 700 人，“八二六”派组织有 100 多人，保守派大约有 200 人。其余约 200 人始终未参加任何组织和活动，他们叫“逍遥派”。以上说的是每个组织花名册上的人数，实际到校活动的人大约是其中的一半。每个组织中，大体上以班为单位组成战斗组，也有跨班级的。

战团成立之后不久，“红成”总部勤务组成员，中医学院的一个大学生带领几个大学生到我校来帮助从事组织建设。他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属于全战团的主力战斗队，全由有头脑、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是战斗组头头）组成，帮助战团勤务组在大事情上出主意。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核心战斗队，成员大约有 20 人。根据成立的日期，它取名为“四二五战斗队”。我是该战斗队成员，并逐步成为其中最活跃的人物。

成立主力战斗队大概是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共同作法，比如川大“八二六”的“一一·一三战斗队”就是很有影响，发言很有权威，能代表“八二六”提出重要主张和理论的战斗队。一个大组织，勤务组的行政事务很多，它需要一个幕僚班子替它出谋划策。同时，组织的头面人物往往需要由出身好或有名气（例如最早造反）的人物担任，但他们不一定是最能干的人。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人能够当头头而不想抛头露面，但又想在组织中发挥特殊作用。主力战斗队可将他们一并延揽。当然，能发挥较大影响的并不限于主力战斗队，这全看人们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力。一般而言，一个大战团的勤务组成员，如果要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以及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与一两个有实力的战斗队有特殊、密切的关系，或者原本就是由这种战斗队推举出来的。他地位变了，但不放弃该战斗队成员身份。他依靠这个战斗队替他收集情报、分析形势，通过这个战斗队的大字报、文章、刊物表达他的政见。他也把上层情报最先捅给这个战斗队，在勤务组和全战团内维

护他的特殊利益。这就和过去的军事将领往往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一样。

这个头头还给我们作了关于形势的报告，他是中医学院高才生，人极聪明，很有头脑，但有时给人不正派的感觉，人们称他为“烂脑壳”，就是这个意思。他在大会上给大家讲形势，我觉得他讲得颇有见地。但他越讲越忘乎所以，最后大讲什么斗争策略，如引诱对方犯错误之类。许多同学气愤起来，说他不是革命组织的头头，而是一个政客。

在实际活动过程中，“四二五战斗队”中的核心成员逐渐取代了战团勤务组的大部分工作。因为勤务组成员是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和平衡各个山头名额而挑选的，其中有的人没有能力，逐渐不起作用。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毕竟与以前的党团组织不同，也不同于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它们遵循当时宣称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原则，组织人选和方针政策最终是通过投票确定。在局势复杂多变的时候，头头的变动频率很高。造反派战士既然敢造当权派的反，一个头头也就根本不在话下。意见不合，得不到拥护，一个提议就可以举行投票，请你下台。当然，绝大多数情况是定期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由于在“四二五战斗队”中的作用而慢慢变成了战团的头头。

这个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参加“红野”不久，同学们就看出我体现了一种严格要求自己，敢于解剖自己的作风。很多人参加运动还是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他们怕头头品行不端，行为不轨，自己盲目追随，到时候会跟着犯错误。他们不断提出要我当勤务组成员，这使得我极其为难。我参加组织晚，而且家庭出身总是个问题。但一般人不知道我的苦衷，想“赶鸭子上架”。有一次逼急了，我大叫起来：“我们革命造反组织还是该讲点阶级路线吧！”我成功地抗拒了一段时间，后来越来越难于抗拒，而且我对于介入运动的兴趣越来越大，决定不管那么多了。

我的好朋友闵也是如此，他在另一个中学当了头头。他参加的是“八二六”，这一点对我们的关系一点也不重要，我们还是极好的朋友。我和他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虽然不愿当头头，但更不愿意放弃可以在运动中做更多事情的机会。我和他在小学、初中一直是班干部，热心于公共事务，并习惯于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在高中的三年，我们的这种热情和愿望被大大压抑了。是文革运动重新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深知这机会难得，因此有必要冒冒风险，即使运动后期要算账，这个风险也值得冒。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和以前在班主任手下工作大不一样。这一次，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也许，我们内心还有一种不会公开讲出来的想法，我们自认为觉悟高一些，能力强一些。与其跟着那些私心杂念较多或糊里糊涂的人干，不如贯彻自己的意志和见解。

战团成立之后，我们和“红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在“红野”内部容忍有“八二六”倾向的人，但组织上已经完全是“红成”的一部分。随着我越来越

越多地介入活动，我与“红成”总部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与几个主要头头的交往越来越多。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造反派组织以敢打敢冲著称，虽然他们常常面临复杂的政治局面，需要许多政治智慧和技巧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最重要的头头主要还是靠个人品质而得到广大战士的信任。比如“红成”的第一把手武陵江，他是地院学生，文革前是党支部委员，曾以学雷锋标兵著称。他待人真诚、热情、谦虚，从没有当大头目的架子。他爱做好事，以帮助他人为自己的天职。在总部，扫地、打饭，什么事都抢着干，大家对他是一派赞扬。另外的头头各有特色，电讯工程学院的蔡文彬被认为是最有政治头脑的，他和对立派打交道总是作出一副高姿态，很乐于让步和妥协。大家对他有很多抱怨，指责他不为本派利益力争。但周恩来很欣赏他这种风格，周恩来在接见四川地区代表时总要问：“蔡文彬来了没有？”也许从根本上讲，他的高姿态只是一种姿态，是能以另一种方式获得最大好处。当然，也有一些政客式的人物，他们没有原则和主见，但极具小聪明，办一件具体的事能干极了，常能急中生智。

我还发现，“红成”总部这种机构有许多毛病。第一，它和官方的党政部门类似，官僚气太重，什么政治部、组织部、作战部，门类齐全而没有效率。不像川大“八二六”，常常召开全团大会，让每个人有充分机会发表意见，行动时则各自为战，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人都发挥各自的首创性；第二，“红成”的总部没有太大的权威，许多实力人物宁愿当大学里或系里的分团长或支队长，推举到总部的人并不是最有发言权的。因此，总部的决定贯彻起来并不得力，总部常常被下面有实力的大学拖着走。但它毕竟又是总部，有时它的决定并没有集中体现大家的意见，但各学校也要服从执行。总之，这个总部与下面脱节，官僚气息浓厚，办事不精干。因此，川大一个学校与“红成”十来个学校相对抗，也并未占下风。我这些看法，当然是经长期观察才得到的。

## 理论家

我在战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和我能写大块头文章，与“八二六”派进行论战有关。

“红成”和“八二六”的分裂，虽然起因于对一次批判李井泉大会的不同态度，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显示出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对形势的估计，对运动最终目的的理解，对中央战略部署的执行，等等。双方都攻击对方是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并没有真正执行革命路线。“红成”的头头坚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想和对方进行一场论战，以

澄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但除了一些大学中个别战斗队有零星文章涉及这一题目，长时间未见正面论述理论分歧的重要文章。

我决定自己来做这一工作。我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和“红成”总部头头有不同意见，但在思想理论上，我完全赞同“红成”的思潮。我决心做这种思潮的捍卫者、代言人。

我虽然对“八二六”的主张相当熟悉，但仍然仔细研究了他们自运动以来发表的所有重要文章，包括他们对于四川和成都地区运动形势的声明。我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写出一篇论战性长文，叫人油印成大型传单，在成都市广为张贴。文章的题目早已忘了，根据那个时代的时髦，很可能是“我们对于时局的若干看法”，或者“我们与川大‘八二六’的根本分歧”。我在文章中抨击“八二六”的主要方面，是说他们从不按中央关于运动的战略部署办事。所谓战略部署，在文革中是一个极其重要、广泛流行的概念。它指中央针对运动的某个特定阶段而颁发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不言而喻，红卫兵组织应该拥护文化大革命，力争实现运动的最终目标，但这还不够，关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实现运动的最后目标，中央要求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任意行动，我们要服从中央的解释、要求、规定。总之，中央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坚决干什么，中央未叫我们干的事就不要去干。我们不应该自行提出革命任务和口号，不能发出和中央号令不协调的声音。这就叫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文革中，这是对红卫兵最重要的要求之一。“红成”自视为最纯正的革命派，他们宣称自己总是尽全力学习中央文件、《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力争亦步亦趋地跟随中央的步调。而“红成”认为“八二六”从来都不是这样，这是两派区别和分歧的根本所在。

我在文章中从以下几方面批评“八二六”。（一）他们从来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军工厂，不搞武斗，等等；（二）他们从不贯彻党中央在每一阶段提出的中心任务，而是自己另提口号，另搞一套，比如中央号召大联合，他们却鼓吹分裂（他们当然要说得冠冕堂皇，叫做“与机会主义路线决裂”），鼓吹四川乱得不够，还要大乱；（三）他们鼓吹和执行一套极左的东西，比如中央肯定干部的大多数，保守组织中的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但他们把四川所有的干部都看成黑线人物，把保守组织“产业军”称为“产匪”。我把他们的方针和理论归结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倾机会主义，说他们不愿意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耐烦对群众做长期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而是提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方针，企图轻而易举地赢得群众支持。

我在文章中进而提出，“红成”和“八二六”的分歧与争论，是革命派内部两种思潮和倾向的斗争，在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坚持与以“八

二六”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是取得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写这种长篇理论文章，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文革之前，中苏两党之间就国际共运的路线进行了长期、激烈的论战，中共写出了一系列洋洋洒洒的论战性文章，这种文章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除了使我们坚信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而中国正在挽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还激起了我们巨大的理论兴趣。文章的形式、风格、语言对我们也影响甚深，在文革中出现的理论文章大多数是一种模仿。学生中爱思考，喜好理论的人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以及国际共运史。毛泽东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列宁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论战，对我们已是耳熟能详。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小册子中的论战内容和论战风格，为我们津津乐道，学习仿效。按照共产国际、共产党内部理论斗争的模式，红卫兵理论家动辄就给对手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动辄就要进行两条路线的论战。善打“内战”，这是红卫兵理论家的共同特点。

“红成”派头头和许多战士在文革中一直有一种委屈和抱怨情绪，他们认为自己忠诚不渝地紧跟中央战略部署，“八二六”则任意乱来，但到头来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中央文革明显偏袒对方。他们一直想不通，觉得是老实人吃亏。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发表在党的中央全会决议中的政策，那些文件中的规定以及社论中的号召，其实许多都是中央高层斗争的妥协产物。毛和中央文革实际上心中另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并没有把纸面上的东西当成一回事，正是他们带头不照章办事。问题的实质是，所谓的“中央”并不是一个统一体。“红成”所遵奉的，乃是一些表面文章。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正要求于群众组织的，并不是要坚守某些原则和政策，而是要跟人。我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一个组织，是凭着按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行事而取得胜利的。

“红成”总部头头对我写的理论文章颇为欣赏，甚至提出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以“占领理论阵地”。但此事也只是议而不决，而我也对留在总部工作不感兴趣。

我后来发现，我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难以为继。我认为对方并不严肃认真地探讨革命理论，而是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写一些东西蛊惑人心。比如川大“一一·一三战斗队”写了一篇广为流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成都就要爆炸》，我不但不同意其内容，连标题也很反感，成都怎么会“爆炸”？真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我经常为这类文章愤怒，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却喜欢这类有刺激性的东西。眼看舆论阵地一天天被“八二六”占领，我心中十分焦急。后来，有人对我说，不得已时只能以毒攻毒，建议我也用他们那种笔调写文章，以扭转舆论。我想试试也无妨，就写了一篇题目有针对性的大字报，叫《拯救成都》。我

在文章中预言成都即将发生大规模武斗，呼吁大家提高警惕，预先防止。我这个预言当然是对的，过了不久两派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武斗。我的文章不过是力图抢先一步，要对方承担挑起武斗的责任。这份大字报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引起了各种人的议论。不少人，包括离成都很远的人，都到我校来索取油印传单，大家十分得意。同学们常常夜以继日地抄写和刻印我写的文章，很长时间内，这是战团的主要事情。我后来又写过不少类似东西，语言竭尽夸张之能事，抓到一些零星事实就凭想象去发挥，尽量使文章有吸引力和煽动性。这种文章很成功，但我却暗中感到悲哀，为什么严肃认真的探讨就无人理睬呢？我的东西轰动一时，不过是为本派取得宣传效果罢了。我宁愿继续当理论家，而不愿意当这种宣传家和鼓动家。

现实就是这样令人沮丧，肤浅的东西总是大行其道，我不能老是去和对方比蛊惑煽动的本领。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一个小楼上设置了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

看到他影响日益扩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气愤之下，我决心认真对付他。我先到川师去摸他的底细，“红成”的人自然说他坏话。他们告诉我，此人极为狂妄，自称是思想上的拿破仑，说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调动千军万马。他成功后，每天广播时有人在旁边为他打扇，尽心侍候他，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我派了一个忠诚可靠的下属，在他的广播站对面找了一个房间，每天认真记录他的广播内容，准备以后在理论上与他算总账。我这个下属极为勤勉可靠，几个月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每天返校交给我一厚沓记录材料。

但这些材料后来并未派上用场，因为形势变了，文斗变成了武斗。